



中國國民性論

高明譯

上海
北新書局
1929

238

中國國民性論

重慶市圖書館藏

日本 渡邊秀方著

高 明譯

目次

第一	論天命	一
第二	論孝道	一五
第三	論文弱的和平主義	三三
第四	論實利性	六一
第五	論自利性	七三
第六	論保守與形式	九七
第七	論趣味性	一二一
	一、黃卷尊重	一二一
	二、華麗濃厚、堅牢巧緻	一二六
第八	論矛盾性	一四一

54-6.5
751
2

= 03683

一、思想之矛盾·····	一四二
二、冷熱之二面·····	一四六
三、差別的而又是平等的·····	一四七
四、排外的而又是同化的·····	一四九
五、文弱的而又是強韌的·····	一五二
六、貧富之兩極·····	一五四

譯者序

聽說在古希臘台耳海神殿中有一句警語，便是說：「知道你自己」。

現在聽說革命已經完成了，這是最可喜歡的。不過我總以為，人物不過是精神的表現；精神根本不好，打倒（？）一兩個人是毫無用處的。行投壺禮的孫傳芳被打倒（？）了，然却難保此後沒有行投壺禮的委員或部長。我們若看見一兩個人倒了便以為中國有了出路，那是未免有「神經過敏」之譏的。

中國一般青年以前的救國運動，頗有偏重於物質方面的傾向。不過我總以為改造中國，并非從歐美搬回幾架機器，造幾所三四十層的大樓，吃一點西菜，穿幾套洋服，……便算了事的。依我看來，這些雖也很重要，不過似乎還有比較重要一點的。那便是國民精神，國民道德。一般人以為強健身體，便是鍛鍊筋肉；這是大錯的。肺爛去半邊的人，筋肉無論如何發達都是沒用的。同樣，我們可以說，不把

國民精神，國民道德弄好，中國前途是沒有希望的！

同一樣地在兩條鐵軌上走幾節車子，中國的交通使種種方面都不及外國！所以若以為輸入一點物質文明便算救了中國，那是不對的呀！

中國人以前很驕傲，後來吃了人家幾下虧，表面似乎這種驕傲是沒有了，然而實際却不然。他們現在還是驕傲的。他們現在的驕傲是：「哼，你再來一下試試呀！」他們的大部分還是不承認自己不好，只是怨外國人不講理或其他。所以似乎還毫無根本改革的意思。

這時候我便想到，一面鏡子是很需要的了。

這也許便是我當時開始譯這書的動機。

日本這一類書出得很多，含有其他作用及不很正確的也不少，我選的這一本，則以較為穩妥。原作者聽說研究中國哲學有年，現在早稻田大學教書。

這書內中材料太舊及失實過誇（這是日本人的介紹的特長）的地方雖也不是沒

有，不過所講的大體是不錯的。

下面是要請讀者注意的兩點：

- 一 原著者受中國哲學的影響的地方也非沒有，所以有的地方要請注意。
- 二 原著者是日本人，常以日本人的見地來批評我們的。這一點請讀者記牢了。一面我們從這書也可以窺見日本國民性的一面。（便是原著者以為好的，拿出來同我們比較的。）

我并且希望讀者們能因此而重視國民性的研究。我們將研究自國的國民性，以謀國民精神國民道德的根本改善。我們將研究外國國民性，以便中國國民之借鑑。臨了對一兩位友人的多少幫忙，敬表誠懇的謝意。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譯者記

又原書係日本大阪屋號書店出版，題名支那國民性論。

譯者附誌

第一 論天命

漢民族的關於天命的思想，是自太古至現代的一貫思潮之一，是不待論地理的區別而應認知的重要國民性之一。考察中國人的性質而放過了這天命思想，那末簡直是難于討論下去的。天命思想實是這樣一般的，根本的思想！

那末，這「天」字含着什麼意思呢！這「天」有時候止是稱那蒼蒼大空的形體的天；「天道」的天，乃是中庸上所說的「以誠爲天之理法」的法理的天。稱「上帝皇天」這時候的天，乃指有道德的意志，照鑑世界萬有的一種不可見的人格神的主宰的天。其中用得最多，支配他們人心最重的，乃是這「上帝」「皇天」的主宰的天。在堯舜三皇時代，所謂「天」這個字，也被用作種種意思，就中支配了他們的心的中心觀念，乃是他們的道德的最高制裁的人格的天。所以從天之明命（即天

意）而始終者，乃天命之所歸。他們是以爲神明是依其從天命與否，而加以賞罰的。

湯王出師討夏桀的時候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說：「予畏上帝，敢不正之，」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天意天命」，于他們實是尊嚴的權威。他們以爲上帝是在道德方面主宰着天地，所以相信天帝與人類之間有一貫的「道德的意志」的疏通，人天是感應的。

如此，他們把在自然界起的一切災祥異變都解作道德的，以爲是神明對我們的德不德的應報賞罰。

從這人天感應的思想，而產出了有名的禪讓放伐思想。

又在尚書舜典裏面有「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這是堯之苦心所在。他已年老倦于事，不能綜覽政事，所以必找一後任；這當然要拔擢出有才德的人物，以期不背天帝的意志。

譬如誤了人選，則神明馬上就能降下災罰，國民全體都要受殃；所以他對這點似乎體驗了種種苦心。就是，雖叫有才德之士都試于諸事，然還不得足使堯帝滿意的大人物。

當時民間傳說虞舜至孝，所以以之試于諸事，後來察出這人替代自己做天子，方不至違背天帝的意志，于是才使舜攝了帝位。當時舜對堯之不讓位于其子而禪于己，似乎毫不驚奇，以爲只因己非其器，所以讓之于別的有德者的。帝舜禪位于禹的時候，也是與這一樣的。禹對舜之不禪位于其子，也沒有一點奇異的樣子。尚書的文字是莊重的，沒有一點私心的。舜帝禪位于禹的時候，曾有這樣的話：

『來，禹，降水做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天之歷數者，乃天命之所歸。便是說，這是衆口之一致，輿論之聲，所以禹也

不能固辭的。

所以「天子」畢竟乃是替代天意治百姓之謂；沒有治民之才德者，是沒有體天意而爲天子的資格的；這便是堯禪于舜，舜讓于禹的原因。

所以苟有才德不足以治民的天子，因爲他沒有做帝王的資格，所以把他廢黜放伐，這當然不用說也不外是遵從天意。所以湯放桀，武王伐紂，一般人民都以為是稟天命，行了事理的當然。

然而時過世遷，天命思想也多少生了些變化。這便是天命之觀念中加了自利之念。加了此念，堯舜時代的崇高的觀念當也隨之而稀薄。禹之子啓，已繼禹之後當了天子。這也許啓這人很有才德，不過從堯舜的精神看來，多少總似乎加了些自利心。

據尚書說，當時名臣益，已攝行天子之事十年；并且這時有大諸侯有扈氏，對啓之卽位似乎是大不服氣，而沒有奉啓帝之命。然啓以武力討滅了他；所以因爲他

的威勢，天下才都歸順了他的。

觀此，可知當時對世襲君主，不滿者實是很多。啓帝以後，完全變了父子世襲的天子；所以若有暴君出現，則當然會有人受了天命而來放伐他的。

周書秦誓裏面說，武王大會兵于孟津，對諸侯伯誓曰：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災降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

這是形式的一片辭令，雖不無藉口天道天意之嫌，然而一般人民都滿足了他，而讚美湯武乃中國歷史上的聖人。

這種極端的民主主義的思潮，是在中國歷史裏一貫無渝的思想，所以無論怎樣英雄豪傑，若失了人民一般的信用，——因之也作爲失了天意，按道理是被排斥的。又雖爲匹夫，若得了衆人之心，那末他便是適了天意的人。

漢之高祖，乃自泗上之亭長起身，終開了西漢四百年基業的豪傑；不過無論怎

樣得民心，亭長出身，總似乎有些輕易，不怎樣神聖；這若不與常支配着漢人的精神界的天的思想結合，總不能十分穩妥的，所以一面附加了古來的感生說，一面又聽了一個博士的『黃帝之子孫中，有名劉累者』之說，乃以姓劉氏配之，硬說自己是黃帝的末孫。——像高祖那樣的英雄，尙非如此說不可。

所謂感生者是什麼呢？普通的人，都是有父而後生的，然而帝王是有母而無父的。就是，他的母親乃不依人道而孕，就同說基督的生母馬利亞感于聖靈而孕基督是同一筆法。

黃帝之母，乃『大電繞北斗之樞，照郊野，附寶（黃帝之母）感而生黃帝』；漢高祖母與龍交而生高祖。——這便是所謂感生說。新稟天命而登極的所謂創業的天子，一定附加着這感生說的，不然也總另有一種極奇異的傳說。

據說宋太祖生時，『赤光滿室，營中有異香一月，人謂之曰香孩兒之營』，總之爲的是要將帝王之爲神聖體，示于億兆，使知天命之所歸。就同我們日本的豐臣

秀吉一樣，他起身匹夫，位登關白（昔時輔佐天子，行施天下政務的大臣——譯者註）極人臣之榮，然憂門閥無可誇，不足使羣臣屈服，乃又唱導出一種感生說，就是誇稱什麼『我母親乃夢入日輪之懷而生我，所以我位登關白，乃是當然，是天意』。——兩者是大同小異的。漢代之王莽欲遷漢祚，又其後魏晉篡奪的時候，也都是利用天命說的。

其他中國革命的時候，大抵都是將天命說背出來的。若看歷代禪讓式時的詔勅，——就是要讓位的人的詔和受了讓的一方面的詔，簡直是千篇一律，都是把天命說背出來的。譬如說，東坡的表忠觀的碑文上面，有什麼『皇受宋命，四方之僭亂以次削平』，說天命之歸宋；明太祖即位之詔上，有什麼

『朕惟中國之君，朱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王天下，傳子孫及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之士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之庶民，荷上天之眷顧與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等等。

由此觀之，有天德之人，是能從漢人以外的沙漠中出來君臨中國的。從我們（日本人自稱，以下仿此。——譯者註）看來最可笑者，便是受了外敵之侵入，勢窮之時，還是照樣將天命說拿出來，說這是天命，人力是無可奈何的，於是大家都棄矛迎敵。

宋朝滅亡的時候，明朝滅亡的時候，爲其國粉身碎骨，做了護國之鬼的，真是爲數寥寥，殆不足言。清朝開始稱霸遼東，還沒有討伐明朝以前，明之朝臣們，上疏於清之太祖，說天命已歸了他。——這表文據說現在還保存在那裏呢。

神聖的古代思想，因世降而有了大變化，而不得不感到這樣的迎合主義暴露的悲哀；然而一般中國人，也還是似乎毫不覺得可怪。

這樣的思想，性質，殆疑爲中國人固有的特質。中國二十四史中，忠臣義士是很多的，然而從國民全體看來，忠臣義士實是少數：那些人似乎都被看作偏性一樣。大抵的人，都說這是天命，沒法子，真如同沒那回事似地奉仕新朝。在中國，奉仕

二物，從天命上論起來，也是能全忠的。

所以薄志弱行之徒，也間有大利用這迎合主義，獨全的天命論的。這思想似乎是發生自戰國時代前後；像墨子那樣，他唱導了非命說，大大地攻擊了迎合主義，痛罵了運命論者。

墨子之非命篇上上面說：

『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也，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驅從百姓之事，故執有命者，爲不仁。』

這是墨子痛擊執自利的天命說者的。

荀子比墨子更猛烈地否定了天命。他的天命篇頭上，說：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節用，則天亦不能貧，養備動時，則天亦不能病，』

他全然排斥了天命。

荀子是法家之師，大概當時就目擊了天命思潮的弊害了吧；尤其是貧賤的人若以貧賤是自己的命而斷了念，毫不努力，則世間將如何呢？國家即不至滅亡，大概也不得不說是十分危險的。荀子的天命論，實是憤激之餘發出來的言辭。

然而支配着中國國民中流以上的思想界的儒教，其中之天命思想，却是牢不可拔。只要儒教的經典行在中國，那末天命思想今後也可大筆特筆作中國國民性的重大性質之一吧？

在論語及孟子裏面，可以發見多少『命也』『天也』這一類話。孔子在宋國時，桓魋曾欲害之，這時事態切迫，孔子的身命很危險，弟子們都倉皇失色，祇有孔子泰然絕不爲動，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毫無狼狽之色。

又曾在匡國，因陽虎的狀貌與孔子相似，所以被匡人所圍。這時候孔子任命於天，說：『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

這種地方，確是非孔子不辦的。確信主宰的上天的加護而不動，這樣的地方很表現出深的宗教精神。只要看他說的「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也可見其知天命之深和自任之大了。

所以在儒教中心的中國，是相信宰相的政治若不好，則有飢饉水害的。據說湯王常大旱之際，以六事之不德自責，天使沛然下了雨。——這便是其適例。

在漢朝等等，宰相因天變地異有辭職甚或引咎自殺者。

前漢之丙吉宰相，在當時是被稱為名宰相的，嘗出遊，路上有大爭鬪，死者出數名，他毫不以為什麼地看過了；看見喘牛走過，却大為驚惶，使從者問牛行幾里。人見之，都非難丙吉宰相之輕人命而重喘牛，丙吉曰：

「大凡一國之宰相，不可拘泥於人民的私鬪等的小事。百姓打架，乃京兆所應禁；這別有其人，非宰相所該管。春天還沒覺得怎樣熱，牛却因熱而喘，這是很

奇怪的。這是失了節氣的事。三公不得不想想天地陰陽之事，以備不慮之災難。

我乃以宰相之職分而憂之者。」

據說當時上下一般人民傳聞之，都以為是通於大體的公論，大家都感服了。

看看這一類事件，也可以知道中國一般人都將天人的關係想得非常密切。

所以歷代天子祭天的儀式是實在極其壯觀的，而上世重祭祀尤甚。《舜典》上面有「肆類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上帝是天，六宗是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山川是名山大川，羣神是古之聖賢之類。其中祭上帝，是王者的特權；臣是不得祭的。王者築壇塲於國都之南郊，燔柴而祀之。現在都還在北京的大壇，便是其殘跡；實在是非常壯大的。

中國的拜天思想，與天命論混融密着，簡直就說牠已成宗教形式，亦非過言。庶民匹夫遇見了人力無可奈何的事，也都有常託之於天命的傾向。

在日俄戰爭的時候，捉到了中國の間諜，處刑之時，起初哀訴歎苦，醜態畢

露，及至知道不能免時，聽說神色自若，大有坦然就死之風，毫無狼狽之色。——這種傾向，想來是能有的。別一方面，譬如事業等等失敗了，比較的不煩悶，以為什麼事都是天命而安心了。

那有名的猛將項羽，垓下一戰，雄圖粉碎，望烏江逃命，此時江水淼茫無限，只有一葉小舟，有人勸他再舉，他說：「天之亡我，我何渡爲！」於是自刎了。——這位英雄的末路，實是雄壯的千古美談。像項王那樣的猛將，也自覺天命之無可奈何。

宋之忠臣張世傑，與元之大軍惡戰者十數次，他的忠誠，也無可挽回大勢，可憐崖山一戰，帝及從臣都變了海底藻屑。他誓要保存趙氏之祀，所以望安南逃走了。至平章山下，颶風大作，舟人主張將軍船靠岸，世傑不答應，向天呼號着說：「若天意不欲存宋之社稷，大風可覆此舟！」終久沒在海底了。

就像這個樣子，天命思想是深深侵入中國人上下的思想；單是「命」「命運」

「天道及上帝」，對照古今文籍考證地論起來，其意義固涉多端，然大體概觀天命思想，我相信能從中國人一般抽出「信天命如宗教，而處安心立命之地」這一點。

第二 論孝道

（論祖先崇拜和孝道，以及忠君思想）

尊祖先，重孝道，這是東洋人一般的重要國民性之一；在中國，孝道尤行得徹底。在儒教的經典上則有「孝爲百行之首」的話，將牠看做了比忠君思想更根本的倫理上的大宗。孝道之意義我後來再慢慢地說明；這孝道總之是不止盡孝於父母，究起本源，自然是到祖先的。所以要究孝道之源，非溯至祖先崇拜不可。

中國人是自古相信靈魂存在的民族；他們相信人死了，魂則昇了天，魄則止於死體，以照鑒人間，而監視其行動。這不獨只是中國人，古代民族，都是抱着這種信仰的。埃及金字塔中之屍體保存（*Mummies*），便是以這信仰爲中心的最大土功之

一。

所以中國人在人死去之時，總是取其人之上衣，登在屋上，用衣服招魂三次，下來蓋在屍體上面。這叫做招魂之禮。這樣死者若仍不復生，這才發哀準備葬送。

楚辭裏面有「招魂」「大招」之賦，歌「魂歸來，不可以止於北方」「魂歸來，君勿下此幽都」等句以弔屈原之魂。所以他們葬死者時總是設棺槨，以厚葬爲主。在日本葬一普通人之時，是非常簡單的，棺材等等，都是用薄板做的，中國的棺材，是比較永久堅牢；稍有資產者，都用很好的棺木。中流以上的人，都用棺與槨；這棺槨上面，施有雕刻，極其華麗。

所以普通沒有資產的人，關於棺材的事，似乎是很費盡心血的。

水滸傳上，毒殺武松的哥哥的惡婆，乃聽說生前武松之淫嫂與情夫西門慶會施給她棺與經衣，所以大爲心動，而終代出了毒殺武大郎之計。

其他中國人的無產者爲了棺木是怎樣費盡心血，是隨處都能看到的。這都是因爲相信死後靈魂不滅，所以才如此的。

中國人相信人死之後，魂氣輕，所以昇了天，魄則殘存於死體而爲鬼。他們相信鬼魄是永久存在的。所以埋死人骨頭的地方（墓地），有時有宏壯的家廟；據他們的風習，一家有了什麼大事，總是將一族會在這裏商議的。

所以他們擇墓地的時候，是很費了點心的。因爲他們相信祖先的靈魂在墓地守護着子孫。就是，死者之靈魂與其子孫，是看做有密切關係的。因此中國古來講風水講得很麻煩。父母死時，先使筮人卜其葬地，以決定方位之可否。這風習似乎有了很古，在儀禮上有哀子欲葬其父使筮人卜其地之可否之禮。這就是筮宅。

爲何擇墓地要這樣費心呢？這是因爲他們想像自己一家有接三接四的不幸，或遇到了不測之災，這都是因爲墓地的風水不得宜，所以幽魂生變的。所以宅地墓地等地域，照例是擇風水好的土地的。風水的本義乃擇天地二氣自然相調和的地域，以建都城，營住宅，造墳墓。就是選擇於人生最有利的地位。

這個思想，不但只是中國人，世界無論什麼人類，都重視所謂地利的；這毋寧

說自然的道理。我們日本，也受了中國的影響，至今在民間還有宅相家相等麻裏麻煩的風習。然而在日本，選擇墓地風水等等，一般是不很有樣子。這風習以中國爲本元，所以長於風水的筮人出得很多，古來有名的陰陽師也不少。其中三國時代的管輅，晉時代的郭璞，是其有名者，是風水術大成的大家。在現今以葬穴選擇爲專門而生活着的風水先生，還是到處都有。所以在中國當敷設鐵道電信水道等文明利器之際，在「害其地風水」的理由之下，招了意外的反對，往往因之而變更預定計畫或取迂迴線。

因爲相信靈魂之存在，恐怕死者之魂魄感到寂寞，所以殉死之風，中國日本都有之。這恐怕中國是本家。天子或王侯等高貴人死時，常有其近臣或平常寵愛的佳人殉死以做其靈魂的伴侶。

我們日本在垂仁天皇的時候，依野見宿禰的獻策，作土偶以代人，此後遂不用殉；不過也間有爲了其主君的知遇之恩，或愛慕丈夫之極而殉死的。

中國從什麼時候開始不用殉，這沒有明確的史實；總之從前是用殉的。春秋裏而記着邾之莊公崩時，葬式裏面曾用車五乘；殉五人。

在近世也還有受了君之大恩的宦官殉死的事情，在民間也往往聽說有集丈夫之寵愛於一身的美妃殉死之事。

就因為這樣的原因，中國的人民有信祖先靈魂存在，崇拜之以祈家運長久之風。所以中國的家廟，恰與我們日本的氏神是同一格，成了人民崇拜之的。唐代的郭氏顏氏的家廟碑，聽說現在還有在那裏。如上述之信厲鬼的風習，至清人蒲留仙的小說聊齋誌異，乃最總括地被描寫了。這部小說是十六卷四百四十餘篇的一大短篇集，全部的話材，皆由狐怪厲鬼而成，竟是些什麼厲鬼借人之屍體復生，豔麗秀曼的佳人的厲鬼與生人相交等等之類。這小說，中國人所有的階級都是愛讀的；這也許是因其文辭之魅力，不過從另一面看來，也可以說是「他們是信鬼神存在的國民」的證據。

反過來再看一看中國的思想界，厲鬼存在這事，是被各學派所研究，所包容。

儒教是不用說的了；在老莊學派，關於生死這件事，也是很認真研究的；又如墨子，他尊鬼神之靈，他們的存在這件事，簡直是他的論文的好資料。到了漢朝，神仙說勃興了，所以魂魄或幽魂之說，亦隨之而更變為神祕；中國人關於魂魄的觀念，遂很牢固了。并且照例的自利心與迷信相錯，於是便牢刻在中國民衆的精神上了。

既有祖先魂魄百世不滅的信仰，所以崇拜祖先，以孝行爲百行之基礎，這是很自然的順序。

在古代，孝道思想是如何支配着中國人心；只要看看帝舜的孝道便能明白了吧。不用說舜是大孝之人；他的父親惑溺於繼母，其性質是極頑固的，繼母的嘴很討厭，弟象又很驕傲，總之其家庭實是非常慘憺的。并且父母屢次設策想把舜殺掉。然而舜總是委屈順從，從沒有過反言，而以至孝責自己之未至。其大孝天下周

知，終受了帝堯之讓而做了天子。

這可以看做舜之大孝動了天下之輿論，可說是漢人如何重視孝道的倔強的好資料。

以後儒教的經典出了世，以孝道作爲其教義之根本思想，這更使孝道普遍了。儒教說人倫大道的時候，也不是不講君臣之事，夫婦的關係，朋友之情等等，不過是以親子關係爲其根本。爲什麼拿親子關係作本幹呢？關於這個，也許有種種看法，不過第一是因中國的國體關係。在日本那裏的國體，君臣關係是重大過於親子關係的；不過中國是易世革命之國。他們的朝廷，真是旦秦夕漢，毫無一定。英雄秦始皇想以傳於萬世的帝基，也僅有二世十五年便亡去了。中國的二十四史，簡直可以完全看做革命的歷史。其如何也可見了。

在中國成全忠君這事，有時候是很困難的。譬如秦滅而漢代之的時候，或者宋亡而元代之的時候，在這時候還是應當盡忠宋朝呢，還是應當奉仕新朝呢，這去就

是很難的。在這時候，他們仍是請出了那天命說，形式地粉飾其體面，不過中國人無論怎樣自利，其朝廷之命數有了幾世紀，對國民全體加的恩威很深的時候，以身殉國難者却也不少。唐朝安祿山反的時候，或宋朝滅亡的時候，忠臣比較的不少；不過殉於宋朝的國難，做了趙氏之鬼的張世傑文天祥，由一般民衆比較起來，也還不過是大海之一粟。他們的大多數，依然是以天命論維持體面，降服了北狄之元。

忠君兩字的字義上的解釋，看來似乎中國與日本都沒有相異的地方；然而看其行動所顯，兩者間却大不一樣。這或者是孟子等唱導的民主思想和莊子那樣的極端的個人獨全主義訓練了中國人腦子的結果。總之中國的忠義沒有日本人的忠那樣的純粹，這總是事實。

中國人很多是計君恩之輕重而報之的計較的忠義。爲忠義的忠義，簡直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古來被稱爲忠義之士的晉之豫讓，便是計較的忠義的好標本。中國的

忠臣第一要數諸葛孔明。若讀了他的出師表，我想大略可以想像得中國人的忠義是怎樣的性質。孔明從出隆中草廬一直到五丈原散爲曉星，前後三十年，爲了蜀帝廢寢忘食，以報君恩。他這樣的精忠，壯烈得真可以泣鬼神。然而使他這樣盡忠義于昭烈帝的根本的動機，是什麼呢？要之這不外因爲感激照烈三顧之知遇。然而若比之日本的忠臣，則我們日本的忠臣是更沒有君之知遇如何的計較的思慮的，在君之馬前打死乃勇士之本分；君危急之際，以自己期死出陣爲最大名譽。日本人無貴賤之別，上下一致，奉仕大君。只要是天子的命令，什麼事都服從的。像那大伴家持等等歌的『到海裏去做浮屍，到山裏去暴骨草上；只要是爲大皇而死，都是不怨的。』那樣的奉公的精神，在中國是很少的，少得幾乎不足道的。

他們的忠君，畢竟是程度問題。君恩如山的臣下，也許有爲了他的君，被中國人一流的感激之情所驅而憤死的；不過一般人都是袖手旁觀，再也不管。譬如每次革命起時他們頻頻接踵爲朝廷而陣歿，則他們國民決不會保得直至現在的命數。就

是，君臣關係是一時的東西，不是像日本那樣永久不變的。

其他夫婦關係，朋友之情，因為根本就是他人之結合，所以有時分離；至于親子關係，則為天然必有之物，獨不能離開的。

所以孔子也以孝道為人類社會中的倫理關係中的最根本的原理。

現在我們看一看古今文獻上面關於中國的孝道的東西，則我們可以將他們的孝，概分為三類。第一可以說是肉體的孝道。只是盡孝養于父母，自己盡力滿足父母的慾望，甘于自己犧牲。譬如說晉之王襲念母性畏雷，母歿後，雷鳴時亦輒至墓地抱着墓標。又有什麼人因老母嗜江水，喜生鯉之膾，每日不厭數里之道，得江水生魚以供母。又有什麼人因為老母在嚴寒之際要生魚吃，于是自己睡在冰上，以自己的體溫溶了冰，得了魚。——這些都是肉體的孝行之例。中國有名的二十四孝之類，大率都是屬於這一種的孝。

第二可以說是精神的孝。一面要盡孝養于父母，同時還要尊重父母，與以精神

的安慰。孔教的孝義，大半屬於這種。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等等，全然是精神的孝道。孔子嚴誠了以爲只供一點酒食便算孝行的那些人們。

子曰：『今之孝也，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這是對形式的孝行下的頂門一針。

又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父母之命，簡直是絕對的命令。

『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這是訓誡自己的身體便是父母的骨肉，做了無謀之事而誤事，是大大的不孝。

第三可以說是理想的或遠慮的孝道。謀祖先祭禮之不絕，且成名遂道，以顯父

母之名；這完全是理想的了。

所以孔子也說：「名揚後世，顯以父母，孝之終也。」，以「期一家之繁榮，盛大祖先之祭祀」為孝道之極致。

明史上面有武義的孝子王世名的事蹟。他得了子孫後，方才報了父親的仇。世名之父被殺，是在他十七歲的時候。世名秘密地買了一把刀，銘上「報仇」兩字而藏起了。他的妻子都還不知道。三年喪終，遊于邑庠，又三年舉一子，遂即語母以報仇之事，終把仇敵殺了，自己也赴邑請死。邑令憫其至孝之情，欲赦免之，世名堅守國法而就死了。

這些可以說是遠慮的孝道；因欲存祖先之祭祀，所以隱忍待得一子後方遂了志願。這個比之日本人的「仇討」，是大異其趣的。中國人總竭力執着于家，他們是靜慮的打算的；日本人是熱情的直情厲行的，而有猛進之風。

中國的孝行，似乎大體是限于以上三種類。第一種的孝，也有稍為高尚一點

的。李密的陳情表那樣思想的孝便是這個。朝廷以東宮洗馬之職再三召喚了他，李密因為他的祖母命迫旦夕，氣息奄奄，餘命沒有幾何，所以他說他不能捨祖母而仕官。陳情表便是將這個意思用情緒豐富的文章寫的上奏文。這篇文章是很有名的，誰讀了都不得不對其至孝之情動一點哀愁。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是什麼時代都很多的。

第三種孝之忌子孫斷絕者，是因為子孫斷絕，便馬上就是祖宗之祭祀斷絕；所以在家族主義的國家裏，是很合于邏輯的。

禮記曾子問篇裏，有「宗子雖七十不可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的話。宗子者，是說其家之直系。這可以看作孔子怕子孫斷絕而說的話。

中國的一夫多妻那樣，其根本意義，是以怕子孫斷絕為原則；并非如西洋人的想像那樣從惡習俗而來。——看作如此，似為正當。

西洋社會的單位是個人，在中國，國家是家之集合，所以根本不一樣的。西洋

人沒有子孫的時候，不以東洋人那樣的理由而悲觀。他們沒有子孫的時候，則咸將一家的財產捐于公共事業。或將自己的遺產分配與親戚知己；不一定要繼續自己的家系。

中國可不同。沒有兒子的時候，總是立與自己的正系最近的宗親以維持一家。所以在中國，家系比滿洲朝廷等等更古的門第，不知有多少。他們的家族，自一族數十人甚至大至數百人；在一家長之下，秩序非常之好。這是很不容易的。在五雜俎上載着張合藝九世同居的記事。水滸傳之英雄九紋龍史進的鄉里，以「史」爲氏的一族繁榮了，成了史家村一鄉。他們有爲了鄉黨是不辭一死的美的愛鄉心。同在水滸傳上，寫着有祝家莊，扈家莊，李家莊三大村協同抵當梁山泊的事。這不可以牠是小說的捏造事而輕易看過了。現今在警察力微弱的中國，還是有各村協力一致抵當同一敵人的風習。因爲有這樣的重一族的習慣，所以氏姓之別是很麻煩的。所以也同日本一樣，是尊重系圖的。

三國志上，蜀之猛將張飛在葭萌關與西涼的雄將馬超戰時，張飛橫矛，大聲呼曰：「不知燕人張飛耶？」馬超笑道：「我乃世世公侯之家，豈知村野匹夫如汝者！」——這樣對罵着，馬超誇着自己的家世。

後漢滅亡的時候，曹操傳檄於關東諸侯討董卓的時候，因為袁紹是四世三公的名家，所以衆議一決，便把他推做了總司令官。晉之高士陶淵明，愧於束帶見小吏，所以即日解印而去了。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曾當過晉之大司馬，自己是他的後代，所以要對小吏屈膝，當然是不以爲潔的了。

爲覆滅秦之天下而給以最初一擊的陳涉，起初舉旗的時候，以爲他們這樣的匹夫是不能收攬衆人之心的，所以利用了賢明開遠的秦公子扶蘇的生死不明，并利用楚之上將軍項燕的生死問題諸說紛紜的機會，乃自稱作扶蘇項燕，并且背出了他們的系圖的體面人。因此才收得了民望，幾乎席捲了天下。陳涉雖後來在中途被刺客刺殺了，不過實不得不把他當做滅秦與有力焉者的唱首第一。我想陳涉若不借扶

蘇項燕的大名，也許不會起這樣的大軍。

這樣的尊重系圖的精神，影響到中國的各學派。儒教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墨子以大禹爲學祖；老莊學派則拉出黃帝，稱爲其祖。普通人中，也是生於儒家者便世世做儒生，攜於文學；商工之家，大率還是做商工人。譬如說，中國營銀行業的銀號，是多山西省的人；浙江省的人，多作代代世襲的書吏。——尊重系圖的精神，連家業都受到牠的影響的。

因爲中國有這樣的習慣，所以他們是以系圖斷絕爲最大不幸；所以「去無子之妻」等等的教言也是成立的。爲人妻者，以無子爲最大不幸。中國婦人爲要得兒子而費的苦心，實在吾等想像以上。這比之歐美婦人之嫌多產，也是一個好對照吧？什麼都以家爲本位；父母之命雖不願亦必從之。一人之妻，也兼做一家之媳。夫婦感情雖好，父母不中意的時候，有時以不合家風的理由，硬將拆開。漢代古詩裏有孔雀東南飛一大長篇詩。這詩的題材便是夫婦被姑婆硬爲拆開的好例子。其事跡據

說是實歷，并非由詩人的想像而成。

『初，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有名焦仲卿者，其妻劉氏，不中婆婆之意，被離棄了，歸了娘家，等候落花再上枝頭之期。時縣令某聞其豔名，再三欲納爲子媳；劉氏固守節不聽，奈爲父兄所迫，不得已而承諾了。不過總不想去。一日出門遇仲卿，仲卿怨劉氏之不等時機之到來。劉氏心如粉碎，其夕投池而死。仲卿聞之，悲傷不堪，亦縊死於庭樹。時人憫之，乃述此詩。』

在中國那樣兒子絕對服從父母的家族主義國家裏，儘有西洋人等所夢想不到的哀話。這便是家族主義的弊害。然而在像西洋那樣的個人主義國家裏，却與之正相反，妻子是虐待姑婆的。妻迫夫要求姑之別居，這是普通的事。西洋親子感情當然沒有夫婦間那樣濃厚的。夫婦穿好的，吃好的，兩親却住在破房子裏，真是不乏這種例子。這不得不說是個人主義的弊害。東洋人的爲父母者，看見子女成了年結婚，是很高興的；西洋人却大抵是不快。我想誰也不能否定泰西文學中寫的親子間

沒有這種傾向。

中國目下什麼事都在混亂狀態中，正在爲要活下去而掙扎，我相信從此泰西種種思想主義是陸續輸入的。中國人將怎樣地用固有的家族主義去善加調和并且同化呢？

第三 論文弱的和平主義

紀元十三世紀末，在蒙古朝廷做客臣，滯留在中國有十三年的意大利的馬可坡羅，在他的旅行記裏面說：「Mandari（指中國人）若是侵略的種族，他們正有着能席捲全世界的大多數的人口。不過，讀者喲，不要杞憂！這些蠻子都只適於當好商人，他們全然沒有當兵士的資格。」

馬可·坡羅是元之朝廷寵臣，是旅行中國內地，習知了當時風俗人情的人。這些話是西洋人說明中國人是怎樣和平的民族的最初記錄，所以是很有興味的。並且其觀察也不得不認爲看穿了這民族的真相。

依我們看來，世界諸民族中大概再沒有漢人種那樣渴望和平的了。他們有的四千年的歷史，畢竟是和平渴望的歷史。他們很少對別的民族從事侵略的攻戰。他們

的戰爭，是自己文明的擁護戰。他們的革命，是嘗盡國家萬般弊害後的革命。其戰爭常是防禦的。他們的歷史是對塞外諸民族的破壞的侵略防戰的歷史。他們的侵略常是依鋤頭的努力的侵略。是以商工之力的商戰。他們的威力是勤勉，是沒有停止的努力的連續。

這麼好的民族，世界上那裏再能找得着第二個？對氣運很長的，悠久的，富有同化力的和平的熱望者，強要提出黃禍論，真不得不說是無謂之極。

我們在這裏可以根據漢民族遺在過去記錄上的歷史的事實和他們的思想上的產物——哲學文藝上面的表現，少許將這事具體地敘述一下。

我們認識中國人是先天的文弱的國民。那末既是這樣文弱的國民，爲什麼在原始時代，能支配了這樣廣大的地域呢？這不得不視爲他們對於利害關係的一致協力和他們的鋼性的勤勉力之賜。漢民族雖也因世之推移，因漢人固有的自利心而常似乎不協力一致；不過在古代，因爲他們不一致便是他們的不利，所以他們協力一

致，熱心勤勞了。這協力一致之念之旺盛和堅忍的意志之力，漸漸的便至支配了這龐大的版圖。

漢人是先天的利害觀念發達的實際家。所以雖是異民族，對不爲害的人種，是漸漸用自己的文化同化他利用他的。又對自己有少少敵對，只要不加危害，因爲他們的性質是悠長的，所以總是以實力悠悠地壓迫他，以特種的文明同化他。

太古漢人從現在的甘肅陝西方面次第移住到黃河流域的時候，現時屏息於貴州雲南的苗族充滿於中國內地，反抗漢人，似乎極其猖獗。又東南地方，就是現在的吳越地方，吳越人蟠居着，其俗慄悍，這也是難對付的敵人。

漢人對這些異人種，盡力以和平的手段臨之。尚書上說苗民屢次作亂，南方人民，大爲困窮，堯帝命舜討伐之。所以舜便受了命去討伐苗族。這時候舜當然也許是引率了大軍去的，不過他不借兵隊之力，却使以干羽舞於兩階。這舞便好像後世的劍舞似的；總之是行了示威運動而服了苗民。有些特別的時候，雖也會用軍隊驅

逐了苗族，不過以這樣的和平手段對敵的事情也很多的。就是，不借兵威而做討滅那樣的血腥的事情，而盡力在和平中以漢人特有的文化去同化他們。若兵陣間兩軍血戰，那當然漢人中多少不得不有損失。在不很利益的事情受損失，非賢人所應爲。求的是和平；以文鎮亂和以軍隊征服，畢竟是同一的事。既然結果大家都相同，那末自然是擇損害少的一方面有利了。

漢民族這樣的思想，是先天的特有之物，若硬要說他全是因爲自利心，那可未免有點不對。道義之念，不用說也從文弱性而來的。

漢民族的北方的所謂塞外人種，却與漢人正相反，都是些兇猛的人種。他們是以殺戮爲耕作，以掠奪爲本業的蠻民。他們什麼文明也沒有，只以破壞別人的文明爲能事；所以中國人無論怎樣眷戀和平，也是對他們毫無容赦地加以侵略的。殷時代的纛，周之玁狁，秦漢時代之匈奴，隋唐時代之突厥，宋之契丹女真，乃其著者。

漢人對這些兇猛的塞外人種，是以怎樣的態度臨了他們呢？他們常以姑息的，退讓的態度臨了他們。他們也不是不問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不過大體總是始終送歲幣，送宮女，盡力求其甘心。他們是這樣憧憬和平的民族，所以在別國不能看見的戰爭談，也不止一二。

據說戰國時代被數做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曾與楚國戰爭於泓之河邊。這時候，當敵軍一半渡了河的時候，宋太子主張加以攻擊，襄公說：「君子不乘人之困厄」，不許攻擊之。敵軍既渡河，軍陣未整的時候，宋軍諸將欲乘此機攻擊之，襄公復說是背禮，不許。等敵軍準備停當，方堂堂地開始了戰鬥。已失戰機的宋軍大敗了，宋襄公也并且身蒙創傷，終因之而喪了命。所謂「宋襄之仁」，雖為後世所譏，不過當時的世評也不一定壞，有的書上曾批評他是縱然打敗了仗也沒有忘了禮儀的君子。這種批評，是只能在中國人那裏看見的特長，賭生死打仗的時候，也還是悠長拘於禮儀，真是迂闊之極，是很有意思的。

中國的侵略的君主，第一要數秦皇漢武。始皇是打六國成一丸的英雄。然而到了平定了六國，統一了天下，布羣縣政治的時候，果然發揮了中國人的特長。始皇不想以平定六國的餘威，去征服爲漢人累世之憂的北胡；天下一統之後，便相信兵器沒有必要了，所以把天下的武器都集於咸陽，鑄爲金人十二。歷史上是這樣寫着的。這當然是中國一流的杜撰記事，決沒有把武器都熔毀了的道理；大概是怕六國的遺裔興起，所以集六國的武器而熔毀了的吧。不過歷史上是寫着把天下武器都聚攏熔毀了的。不過無論如何，他們的方針總是以爲天下既統一，則以和平（不是武斷的）快樂地治天下；這總是無可爭議的。所以始皇帝爲防遏匈奴侵入中國，興了對防備也沒有多大效力的萬里長城那大土功，而涸渴了民力。

始皇若果是侵略的英雄，則爲什麼要施這樣姑息的保守的防備呢？追想這兩件事，可見始皇帝也還不過是中國式的英雄。

漢武之時，名將續出，是中國人最發揮了軍略的銳氣的時候，對匈奴使大吃了

些痛擊；不過這若詳細看來，當然也不是漢人構的戰爭。當時匈奴的朝廷裏，似乎也多侵略的猛主及名將。

他們以掠奪漢人爲本職，出沒極變幻之妙。漢兵大舉擊之則煙散，軍退則雲聚，窺守備薄弱之處而加以攻擊。簡直就是那種狀態。其掠奪也，強奪婦女，慘殺老幼，灰燼家財，野無青色，與西歷五世紀時侵略羅馬領的阿氣拉率領的匈奴是同一做法。

武帝是有銳氣的人，所以匈奴侵入，則應之而血戰了。不是自己進而犯匈奴，所以不是侵略戰。

然而從中國人一般那裏却沒有受到怎樣好的讚辭。他們不認兩帝之偉大的開國精神爲怎樣大；他們的文籍上，普通總是以「窮兵瀆武」這些字來加在兩帝的頭上。

由來中國的「武」這個字，乃由「止戈」兩字成立的會意文字，易上說「神武

不殺』，真的武是不殺。意思便是說，妄用武器殺人，那不叫做武。

因為是這樣的國情，所以中國人自古以當軍人爲不面目，非常嫌忌服兵役。唐宋時代及其以後，進士科舉之際，文官志望者常多，武舉簡直屢次有一個都沒有的事。所以武舉進士裏面是沒有俊才的。看起歷代史傳來，創業天子的時代，文武輕重之度是不怎樣顯著，然而世間漸漸太平起來，則此傾向乃漸甚，終成了歷朝倒滅之因。

武略的日本人民，在太平永續的時候，尙不乏變爲文弱之例。描寫王朝時代的清少納言的枕草紙裏面，以衛府的武士做了嘲笑輕侮的好資料。尙武的日本民族在太平永續的時候都有這種情形。中國人是整個的文弱的國民，所以把太平時候的兵士等等，簡直非人視了，唾棄了，誰也不理他們。唐時代從別處來做王城守備的侍官等等，據說都是當作賤民下戶一樣地對待的。不但是唐宋時代，這種現象是歷代共通的現象，所以是不好辦的。中國俗語裏面有『好鉄不打釘，好人不當兵』，這

大概以兵役爲別無用處的無賴漢的事，滿足的人不應當兵的意思吧？

像這樣的被看得比一般國民卑下的軍隊裏面，當然好漢是不去的；所以兵權之下落，乃自明之理。在軍人被卑下的中國人間，良將猛士不輩出，是當然的。中國看來似乎自古名將豪傑很多，不過實際是怎樣呢？與日本的名將豪傑比起來，大概打了不少折扣還要倒貼錢吧。中國人的文章，是誇張的感激的，假話當然不會沒有的，所以看中國歷史，很要注點意。

在中國也有什麼武廟（太公望）關帝廟等等，以軍人爲菩薩而崇拜之；不過中國人是以怎樣一類的武人做對象而加以尊崇的呢？他們是不喜歡過於猛烈的武的。宋太祖曾行幸於武廟，而從祀於此，他中途指秦之名將白起，而使停止了從祀。這是因爲白起坑殺了趙之降卒數十萬。當時白起的這個處置，也許是對反覆無常的趙軍的萬不得已的手段，不過這種武斷的惡制法，到底不是中國人所能容忍的。他們不取過猛的武，即使屠城，也不得不如宋太祖良將曹彬降服江南那樣。

這樣帝王親自參拜武廟等等，似乎是尊敬名將；不過無論什麼時代他們總是被文官壓迫着的。中國人的名將白起，李廣，霍去病，岳飛等等，大抵沒有善終，其末路是很慘憺的。漢之韓信，曾身受幽禁，叫曰：『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楚已破矣，臣固當烹！』所以從此看來，這種例在韓信以前似乎已經很多，所以已經成了俗語。所以立於中國的廟堂擅威權的，大抵只是文官。在中國，尤以宋朝的時代，把文弱的和平主義發揮無遺。

真宗皇帝之時，契丹曾大舉入寇。中國人是文弱的國民，聽說入寇，總是騷如鼎沸的；這時也照例是所謂內外震駭。朝廷重臣，或請帝駕幸蜀，或勸幸江南。幸虧名臣寇準固執了迎擊策，好容易才進擊了，因之大破契丹，獲敵之大將，使敵軍完全潰亂了。那知真不知成何體統，在這時候進擊之可否論竟百出了。在這時候，也把他們的獨特的遲緩性發揮無遺，簡直差一點失了千載良機。幸虧名將寇準的軍略與殿前之師性急的猛將高瓊，麾衛士進葦，渡了黃河，好容易才轉為追擊戰，破

碎了契丹軍。寇準對皇帝切言乘此時候根本地平定契丹，然而真宗皇帝却說：「數十年之後，大概又有禦虜者出，所以這次就此講和，虜雖要百萬歲幣，比之戰爭之慘苦，不足道也，朕不忍視人民受此困苦。」

大元帥的意志這樣薄弱，當然寇準雖英雄，也沒有法子；所以寇準一個人行了強硬的談判，減輕了歲幣，班回了師。

這真宗皇帝的話，是很能代表了中國歷代天子的心理的；并且人民一般的意向也是如此的，他們以為對打敗了的胡人贈歲幣是當然的道理。他們不以送一點歲幣為傷國家的體面。他們當初便深知與他們胡人那樣的兇猛人戰爭的非利益。所以中國歷代有時候雖也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不過大抵總是盡力以利祿懷柔北狄，以得其甘心。易朝革命雖無論有多少回，然而這政策總是始終不變的。

高宗時代，岳飛，韓世忠，張俊等名將輩出，寒了金人的心胆。然而當時的宰相秦檜，害了怕金病，諸將示擊破金軍，恢復中原的氣勢的時候，他總是很奇妙地

使他們乞和。胡銓的彈劾文，是痛烈慷慨的大文字；『斬秦檜王倫，然後與問罪之師』那一段，真是峻烈如火的文字。不過秦檜本人似乎不以為什麼。中國人似乎以為文章攻擊等等，害不到性命，所以是不怎樣避易的。

當時岳飛是中國稀有的名將，岳軍所向，金軍悉潰，如行無人之境。不過中國人的通病，毫無丈夫氣，喜嫉妬人家的功績。文弱的人物都是有這種性質的；不過中國人尤甚。連韓世忠張俊都難逃此例。盡力構成岳飛的罪名，再把正要恢復的中原之地委給於敵人。并且敵將兀朮，怕岳飛之極，暗地送賄賂於宋之重臣，以殺岳飛為和議條件之一。文弱的秦檜一流的黨人，以為只要和議能成，什麼事都好辦；以懦弱專一的慮見，構成了岳飛的罪。

世上不憫的事情很多，不過以國家唯一的猛將，英略天才震撼了敵軍的名將作為和議條件之一而殺戮了，這簡直超過了悲慘，毋寧說是希奇的事。文弱徹底至此，真找不出適當的批評的話。可憐的岳飛的死，乃告訴了我們宋朝滅亡的當然歸

結。

促宋朝滅沒的宰相秦檜以外，還有無賴的文弱的宰相賈似道。他粉飾太平，主張和議，直至元兵迫於城下。這些人的心理狀態，是我們所不能推定的。不過那是很明白的，這不只是秦檜賈似道之罪，當時的民衆一般便是很文弱，秦檜賈似道不過是其代表者而已。

明朝的滅亡，也不過是把宋朝滅亡的同一事，重做了一遍。文弱的和平思想的實例，真是多如山積。都城被劇賊李自成劫掠了，後來清將好容易才將牠恢復了。

當時清之攝政王多爾袞寄給明宰相史可法的文書，是痛論明人懦弱的文章。裏面有一節說：

「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葬，新君不得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舉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

開明大義名分，真是堂堂的文書。

中國方面的史可法對這信的覆書，是中國人一流的慷慨的文章，是兼着諛辭弔辭的奴隸的哀願的文字。現在誰卒讀了牠，都還有要出冷汗之概。他先讚美清朝的仁義的王道，結尾說請更加勉力。那種狎思想利用清朝的樣子，就簡直與現今的中國外交一樣。史可法的覆書的末一節是說：

「伏維堅同仇之誼，至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首，以洩敷天之恨。」

靠敵國之兵威，把賊驅逐了，對其恩義，不知「同仇之誼」是說的什麼。敵將用了「春秋之義」，所以把「義」字逆用了，而說什麼「貴國篤念世好，兵動以義，萬代瞻仰，在此一舉。」這雖是迎合的「苦時的乞祐」，不過對被漢人累世輕侮嘲笑的胡人，說了這些諛辭，真不得不說是唯一的醜事。若是「大和武士」，則大概沒有一個人弄這樣的婦人口吻吧。這樣的文書，非但表示出中國人的懦弱性，

并且是暴露猎狗的面面的好史料。

這樣的例證，充滿着中國的歷史上，簡直不勝枚舉。所以中國人之不能像戰爭似地戰爭，不得不說是當然的事。近時的革命戰爭，他們也未曾有過戰爭似的東西。據當時滯留在漢陽方面的日本人的實話，中國的戰爭是間歇的，大砲響響又停停，停停又響響，與日本軍人的演習還不能比較。他們的戰大部分是舌戰，是互逞脅喝的恫嚇戰。普通他們有一萬兵隊，總是吹做十萬，有了三十萬便號為百萬。所以中國的所謂名將強兵，一定是本領有限的沒出息的東西。只要看鴉片戰爭時中國人對英吉利軍的行動，或長毛賊的結果，真是將文弱性發揮無遺。尤其是北京被僅僅兩三千英法軍的馬蹄蹂躪一空，當時的天子咸豐帝向蒙古境熱河方面蒙塵一事，真把中國人弱到如何程度這事，公表於世界了。這時候中國人的文弱的「行市」乃定規了。

長毛賊的亂和最近的義和團，都是由外人的威力狠狠地鎮定了的。

以上的事例，不過是拾「中國人如何文弱和熱愛和平」的史上的一小斷片，然而大概已是如此了。

我們日本的蜀山人見韓信鑽勝之圖而狂歌曰：

「斬站在道上的市人而不鑽勝的大和魂！中國是中國，日本是日本，不要光拾

中國的紙屑而忘了日本的刀呀！」（千紫萬紅）

這狂歌端的將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差異歌出了。

※

※

※

漢人種唱導的古來的學說，一般都是鼓吹和平思想的。

先看一看中國人思想的本幹的儒教，其教祖孔子當然是智仁勇兼備的聖人。有

一次門人子貢問政，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他的回答便是說掌一

國之國政，財政和軍備和民心的信用是必要。子貢問若不得已而必去其一，則去那一個呢？孔子回答說先去軍備。於是子貢又問說財政和信用兩個中若必去其一，則

如何呢？孔子回答說去財政。孔子是以爲上下沒有信用的國家，軍備無論怎樣充實，財政無論怎樣豐富，都是不行的。他是說立國的第一要素是信用，舉國一致的和親是第一；不一定便是輕視軍備。孔子自己也說有文德者，必有武備；他當然不是一味文弱的人。不過若說文武二方他置重於那方，則還是置重於文的。

到了受了孔子的正統的孟子，世入於戰國時代，五霸競起，七雄飛躍，所以孟子自然地便受了時代的影響，而至賤視當時的霸道，鼓吹仁義，唱導仁義無敵主義。他說只要行仁義，則秦楚之堅甲利兵，也不算什麼。其論法銳利；大有秋霜烈日之觀，唯自實際的方面看來，則其所論未免迂遠，畢竟不過是學者的桌上空論。

孟子無論怎樣絕叫仁義，以軍國主義立國的楚秦等強國還是毫不客氣地侵略來的；所以孟子那樣的空論，到底是不能實行的。若歸依孟子所唱導的仁義無敵主義而怠於軍備的充實，則自己的國必有馬上被楚秦等強國併吞了的危險。對楚秦的富強策的孟子之教，祇實是文弱迂闊之論，這是無爭論的餘地的。所以史傳上面曾說他

所至皆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總之大家都以為他的所論，是「迂闊而不切於事情」，所謂是一個書生論；誰也沒有理他。降至荀子，比孟子的所論大率健全，不過還是置重於禮，排斥了霸道。其議兵篇，析李斯之見，而說戰應常以仁義爲本。

要之儒教雖置重於文，然而也不全然排斥武。儒教是常識的教，所以始終置重於中庸的。所以儒教可以說是文弱的弊害不多。

老莊學派，則其弊害很甚。這學派包括着可以看做歐洲的近代思想的萌芽的自
然主義，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雜多的思想。在他們眼裏，國家國體等等觀念是一點也沒有的，其主義是極端的獨善主義，是自己中心主義。只要能保全自己的生命，那末無論國家將倒毀，國家將破滅，這都不算什麼的。總之全自己生命以終天年乃其眼目。其哲學是生死一如說，是一身解脫法，是名利超越主義。若常牠是哲學，則或是有趣的學說；不過正是這個哲學，使先天的文弱的漢人更加變成文弱的

了。

他們的文章，是天下一品，史馬遷之所謂沈洋自恣的東西，其筆端不可端倪。一見這放奔暢達的天才的文，便不能掩卷，簡直有這樣的魔力；所以不知不覺便被他們的思想同化了。這正是其特色。他們也并不是特別在這個哲學內唱導了和平；他們的思想，根本與富國強兵策是不能相容的。老子之所謂兵，乃凶器；強兵，乃不祥之類；以一身之解脫，一身之安定爲終局的目的；所以這種非國家主義者，那裏會有什麼報國的精神。與老莊相前後的思想家中，如宋榮子，如墨子，都是宣傳了和平思想的思想家。

宋榮子也就是宋輕或宋鈞，其記事，只是散見在莊孟荀韓等的書上，他並沒有整部的著書。所以未能見到他獨特的奇說，這是很遺憾的。不過把以上諸書上散見諸說綜合看來，則宋榮子是，據莊子逍遙遊所記，乃不顧世之毀譽褒貶的人；韓非子上則說他不戰爭，不以人爲敵，雖被拘於牢獄而不以爲恥；而荀子則對此說加了

駁論。看看上面的斷片的記事，宋榮子似乎是說：『人與人間之爭，是被他人侮蔑了的時候起的感情。所以人若侮辱我，我若不以之爲侮辱，那是不會起爭端的。國與國間之爭，也是一樣的，是因爲太顧慮體面等等而起戰爭的。』宋榮子之說，是與佛陀之忍辱，基督教之絕對無抵抗主義是同派思想；榮子之和平論，是高遠的人生的見解。當然由超越了人家的毀譽褒貶的哲人看來，戰爭等等是很愚的。

墨子對宋榮子的絕對無抵抗主義，而唱導了武裝的和平主義。他不但是思想上的和平論者，他并且是有實力有實行力的和平論者，其科學的頭腦與論理的思考，在中國頗放異彩，可說是與孔子併立而鮮有遜色的大賢，他的學說，非如孟子那樣，強以書生論折伏人；他是有重有熱的人格者。

墨子雖是因兼愛說而出名，不過墨子的思想，不單是兼愛說。他是宗教心很深的思想家，并且他的思想是論斷精細公平，立在論理的基礎上面，首尾一貫着的。由來中國人的發表思想，全是非系統的，缺乏論理的組織的；所以由此點看來，墨

子可說是中國第一的論理的思想家。其學之中心，乃敬神，兼愛，和平，縱貫之則爲神學的功利說。

古來抽讀墨子之說，不能了解其真意而徒加謾罵的孟子那樣的人，現在若公平的觀察起來，其人格到底比不上墨子的。

我們現在不是說墨子哲學的時候，所以我們可以單說說墨子如何爲和平主義而勞其心身。

墨子也像孔子周遊天下以說其道那樣，周遊了天下，鼓吹非戰論，爲了和平盡了人事。所以唐韓退之的文中也說孔子之席不暇暖，墨子之煙突不得黔。下面舉的一個例子，尤端的將墨子是實行的和平論者這事表現了。

有一次南方之強國楚國，要攻位在中原之地的宋國。這時候墨子正滯留於北方齊國。他聽到了這事，十日十夜地，簡直晝夜兼行，趕到了楚國。并且那時候他的脚還受着傷，路中非常困苦。他馬上與楚王會見了，痛論戰之非，想阻止王之攻宋

之計。然楚王說已使名匠公輸盤造了雲梯，并且已經發了動員令，萬端準備，俱已齊整，所以不能便中止戰爭。墨子仍以口辯說王，楚王頑不應之。所以他便請王使楚王造攻器的公輸盤和他鬥一鬥攻守的技術；結果若自己勝了公輸盤，則中止戰爭。楚王答應了這個約。所以兩氏便在王的面前比起圖上的攻守之技。公輸盤攻擊九次，墨子擊退了他九次。公輸盤攻機已盡，墨子的守圍却有餘；公輸盤終究輸了。勝利歸了墨子之手。所以楚中止了攻宋之事。

這樣地，他聽了對自己毫無恩怨，毫無利害關係的兩國間起戰爭，不遠千里，以非常的勞苦與心血，爲和平主義努力了。不只是理論的爲和平主義而努力，他想使諸侯都受和平的洗禮，就是，他努力想使戰爭絕對杜絕；并且他的技工之才，與其創造力，也是可感嘆的。說楚王的時候，也在圖上屈伏了公輸盤；并且墨子當時還說：「王卽把我殺了，也還有我的門人禽滑釐備着我發明的一切守具，率着我門人三百，守着宋國；我早便叫他們去了。所以若要攻宋，請將這事諒察了。」這

不單是中國人一流的脅喝，墨子同門之士似乎很多，并且也都具備着實力。這時若只是像孟子等等那樣的只是口頭的書生的空論，則無論話說得怎樣好聽，大概也沒有什麼效力的。總之墨子與以空想的放談爲高之徒不同，他是兼有實力的和平論者。

如以上，若將中國思想界的源流一瞥起來，大率是以和平主義而始終。在法家者一流，亦非無說富國強兵者，不過這決不是進略的。

這些思想之中，增長中國人之文弱心，使中國人頹廢的是那一種思想呢？這不是儒教，也不是墨家，我以爲實是老莊思想的影響。前面已經論述過，儒墨之和平論，不是無抵抗主義的和平，不得已之時則不辭對戰，是有這種傾向的；至於老莊思想，因爲牠是不把國家放在眼中，所以其弊害可知。

到了後漢時代，佛教流傳，其教理是與老莊思想的性質共通，所以投了文弱的中國人的嗜好，於是更煽起了中國人的文弱性。

老莊思想與佛教之教理，若單當做思想而研究之，則是深遠高尚；中國人是實踐的國民，所以是有不把思想看做單是思想的傾向。他們有什麼事都非把牠表象化不可的性質。他們於是把老佛的懦弱的非國家主義及個人的解脫等思想，做了自己處世的法式。并且這些思想都是應用在一身上的利己的方面，所以是受不了的。

世人似乎多說中國人的中心思想或仰信是儒教，這實是皮相之見。儒教只是形式方面（日常儀禮）的規範；中國人的內的思想的堂奧裏，黏着多少老佛的處世觀，不容易分離：這一點實是不得不識別的。若專依漢民族固有的教義，如儒墨兩教那樣，大概不至於這樣沒有氣力，并且自利心也許不會這樣發達。

後來宋元明清的思想家，說什麼『陰儒陽佛』，不時地排斥老佛，不過不知不覺之中，也被老佛化了。所以可見老佛的影響，簡直成了漢民族的本幹。

現在轉一個方向，觀察一下爲國民感情發露的文藝吧。中國人的詩歌裏，多文弱的詠嘆詩。尤其與塞外民族打仗時代的詩人的歌，是非常無丈夫氣，是充滿着遠

征的悲哀與妻子空房之淚。東漢詩人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裏有「生男慎莫舉，生女
哺用乳。君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柱。」之句，他便是說，男子非嘗戰爭的慘
苦不可，所以生了男孩子不要養大他，只要把女孩兒好好地栽培。

詩聖杜少陵的兵車行一首詩裏，歌生男之非曰：「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
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他很悲着出征軍人的不幸。尤其送出征軍人，相互牽
衣歎足痛哭的情態，也寫在同詩中，真是女人氣之極。這次大戰時，聽說比利時和
法蘭西的將校，在出征之際與妻子哭別，日本人目擊這種場面者，無不唾棄之。這
等的詩，也是屬於同一部類；當時大概杜甫目擊了如此情況，乘着熱血而詠出的
吧。淮南子的人間訓裏面有人間萬事塞翁馬這寓言。這是說禍福的無定，一面又善
將中國人的文弱性發揮了，所以舉其全文如左：

「塞上之翁失其馬，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數月，其馬忽帶一駿馬歸，人賀

之，翁曰，安知非禍，其子乘之，墜折背，人有弔之，翁白，安知非福，後出兵，抽壯丁，多戰死，其子以折背僅存，故得父母。」

就是，因折背成了殘廢，所以免了出陣。意思便是說折了一兩條背，比出去戰死時是好得多；簡直全然是自己本位的獨全的思想。

還有與這個很相仿，更極端企圖徵兵忌避的一個例子，那便是白樂天的新樂府新豐折臂翁。這樂府是歌當時都城長安附近的新豐地方的折了右臂的老翁的一生的。這老翁二十四歲的時候，被徵發而從事雲南征伐。傳聞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乃生起瘴烟，水如沸湯，渡涉此河者，十死二三。此翁不願出征，於是在某一夜裏，私將大石敲折了自己的右臂，成了不治的廢疾，終被免除兵役，歸了故鄉，全了八十四歲的長壽。折了的臂時時發痛，徹夜不眠；然而六十年前從事雲南征伐的人們，多做了他鄉之鬼，一個也沒有踏到故鄉之土。自己雖廢了一肢，然却因之而全了一命，所以比之不幸的出征軍人，是幸福得多了。——所述情節，大體如

此。其中之一節曰：

「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至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瀧水頭，身死魂飛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呦呦。」

這樂府雖是爲戒邊功而作，不過所歌的實是可鑿楚的徵兵忌避。塞翁之馬及折臂翁的思想，全然是老莊思想之流。又後者可以觀察出中國人爲何不願作他鄉之鬼。

其他這樣的例子，不知能舉出多少。其中唐李長吉的弔古戰場文等等，膾炙人口，平面的敘述戰爭的慘苦，蓋尤爲淒愴的文字。

「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觸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砂磔。」

中國人決生死時候的心理，真是表現得很好。若這是日本人，將如何呢？日本日本人對爲仇於神州的敵人，是貪死賭生而戰的，不像中國人那樣沒精打彩，本心不願

地戰；隳屍戰場，乃爲文士者的本意，爲國家而戰死，是以爲武人有終之美的。

如以上所略說，不得不認中國人是世間少有的和平的民族，世界屈指的文弱的人種。歐美人杞憂的黃禍說，對漢民族實不得不主張取消之。同時亦應讚馬可●坡羅之言之不詐。

第四 論實利性

中國民族的一大特色，便是實踐的這事。他們是用現實的，意志的，倫理的，常識的等名目代表的實行家。

他們在文學哲學等等裏面，都也很顯著的是倫理的，不多參思辨的議論，其知識論殆無足觀者。『文章是經國的大業』，『文章而不關世教，雖巧無益』等等，這便是中國人一般的文學觀。他們不在一種實用眼以外，以審美的眼光而觀文章。人間至上之聲的詩歌，都很少將其熱烈放棄之情如實地表白的。被稱爲三代文學之粹的詩三百篇，也都是被處理做補政敦風的政治上教育上的一要具。中國詩人三千年間詠出的可驚的多數的詩，其量雖稱世界無比，然乏於奔放熱烈的至情。他們的詩，多不踰一定禮節之度的思案分別的詩。以詩歌補風教的一種功利思想，一貫地

流傳着。散文方面，也徒多資道德的修養的，或論政治的得失的，及經書的註解解說之類；描寫人情風俗的小說戲曲，則賤陋視之，以爲非士人之所應攜；所以直至很久很久之後才好容易發達起來。

所以希臘羅馬的文學，是以詩歌小說爲其大宗，各以飾其文學史；而中國文學史上的所謂雄篇大作，尤其是在上世的，只是以倫理道德的思想爲基礎而施以文字的修飾的東西。莊子之文之汪洋自恣，孟子之文之雄渾而光焰萬丈，史馬遷之文之神彩弈弈，——他們的傑作的大多數，都不外是倫理思想的餘薰。

這樣地混然融合文學與倫理，形成不卽不離的文字，這樣的類例，在旁的民族裏是找不到的。他國的文學的起源，大抵先有神話和傳說，後來成爲詩歌，小說；這是其過程。中國文學，是以實踐的道德書五經之類，爲其起源。這便和印度文學是與哲學宗教混然融合而發達的一樣。——在中國，純然的文學是在十三世紀，被元人攻略那時候才發達的。漢人三千年之誇，被當時以華夏自矜的中國人蔑視爲北

狄犬戎的元人的馬蹄所蹂躪了，他們的政治的生命也完全斷絕了，餘憤沒有洩的地方，所以屈英雄之身而蹈晦之，寫成戲作，這便是施耐庵水滸傳以下的小說戲曲，有這一部水滸傳，大概再沒有否定漢人的創作力那樣的惑人；小說戲曲被防遏了這樣久的，實在不得不認爲這是由於他們的實際的性質。

中國哲學裏，不但沒有論理的組織，并且簡直也找不出什麼知識論，實體論那樣的純粹的思辨的抽象問題的研究。僅在南方荆楚之間，老莊學派生起了，稍涉及了一點思辨的思想；并且就是這個的中心思想，也還是置重於人間之處世法和修爲養生的功夫。後來雖有宋儒的精細的性理之學，然這是因與佛教對抗的必要上，加味於佛性論而成的東西，決不是中國正統的思想。他們產出的中心哲學儒教的教理，其興味的中心，是集中於人。其題目是利用厚生，是彝倫道德，是爲政養民，尚書——儒教的淵源——一卷的中樞思想，是六府三事九德；這等思想，便是倫理上的尚德主義與功利思想的結合；其根本思想，便是圖以中庸之德，調和功利思

想。

到了孔子，他稟了三代倫理尤其是周代的精神，將實踐的社會精神發揮無遺。他標榜了將政治宗教的一切包容於道德之中的道德中心主義，置唯一之重於德，把中庸之德實現至最完全的程度。他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溫容如玉的人格，其穩健着實，實爲通古今東西之第一人者。

後代被稱爲英傑君主，名臣的，都是他的弟子，論語的愛讀者。不單是帝王，中國所有的渾然的人格的所有者，都是論語的愛讀者。由這些事實看來，可見得他的人格如何偉大，如何適切於實利了。其弟子七十餘人，皆身通六藝的有用之才，任國家的重任的很多，功績也很是顯著的。

孔子的教理的根本思想——五教說的「父子有仁，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那樣，只要世界人類不滅，永遠是必要不可缺的。缺其目之一，不得不說是恰如人體之缺一器官。中國近來已改成了共和國，所以有多少人說這君

臣之義是不必要的，不過這義字，不一定是限於君臣間，愛國家也是義之一面。中國人本來是最缺犧牲的精神（義之大宗）的傾向。我以中國青年們，應停止這種形式的議論，而更擴充一下『義』字的意義。

儒教之綱要，大學，的劈頭的章句，簡明而適切於實用，殆疑爲世界屈指的名言。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此儒教之本領，可說是徹頭徹尾之在實用主義的見地上的。

所以政治經濟等實際問題，織入了他們的哲學中，在悠久的時代中，萬般思想，都被一括在『禮』這一項目之下。周禮那樣，也許有後人的竄入，不過其大體

形式，還是不能否認。

如上述，文學哲學也是一樣的；他們的祖先三皇五帝，都是以勤儉力行，謀產業的進步，努力免除人民的疾苦。

《尚書》裏記載的堯舜禹陶文武等等，都是可爲萬代之龜鑑的英傑；就中像大禹那樣，其意志堅固，百折不撓的精神，大有起懦夫之概。禹王那樣的人，實不得不以他爲古代漢人的意志的代表者。

《尚書》裏面說！『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爲聲律，爲身度。』

當時有世界的大洪水，據說其勢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昏墊。其慘害之大，涉及堯舜禹三代。其排水工事，在沒有文明利器的當時，大概是苦辛慘憺之業吧。無論怎樣的英傑，對這個都是茫然而不知怎樣下手。禹之父鯀，稟堯帝之命，當此防水工事之任，功績不能舉，於是在羽山被處了刑。禹即鯀之子，他稟了舜帝

之命，負此重任，以滿身之努力，嘗百千之艱難，揮赤手而努力了。據說當時禹在外十三年，過家門而不敢入，薄衣食，孝致鬼神；卑宮室，費致溝城。他這樣地賭着身命而奮鬥了。并且悲先人鯀之功業不成而受誅，拚命勞其身心，據說他弄得脛與一毛，也可窺其一斑了。他中斷了現今的武昌的蛇山，漢陽的龜山（即大別山），疏通大江，浚其他九川，通九道，陂九澤，注其水於海，乾其本土。就是分現今的中國本部爲九州，制定「舜貢」，浚成了這世界的大土功。

其意志之強固，其功業之絕大，乃萬古所稀見。如大禹者，不得不說是最能代表中國民族的意志方面的偉人。

中國傳說中，有「愚公移山」的話。（列子湯問篇）這是不用巧智，勉力不止，終達其目的的寓意談；這一面可以看作代表中國人意志方面的東西，一而非時間的魯鈍性，也發揮着。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

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海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担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一山之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患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之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異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由此傳說看來，愚公大概可看作代表意志的實行家的人，意志力能壓倒智巧的人吧。

秦皇漢武以後還費了數世紀才築造成的萬里長城，乃世界三大土功之一，世人之所驚嘆者。其工事，本來是恐胡上的對策，不過總之非堅忍的實行家，這事業不能成功。埃及的三角塔，乃因宗教的信仰而築造的大土工，是代表其信仰力如何絕大的紀念物；所以中國的長城，也不得不說是證明執着於現世的人的意志旺盛的紀念物。不只是長城；煬帝開始的接連黃河長江的大運河，及其他無數的運河，處處都能表示出中國人的勤勉性。一個人的漢人也是頑強的，有慣於築城，勵農業，絲毫都不厭勞動的良風。所以由塞外民族崛起，以兵威席捲了天下的蒙古滿洲等等，因漢人的不知厭的意的努力，數世紀後倒反被漢人同化了，征服了。今日清人的本國滿洲，靠着漢人的鋤尖的努力，都被開拓盡了。農業是不用說了，就是商業，工業，只要有利的地方，都成了漢人的勢力範圍。無論怎樣的大森林，大曠野，在他們的努力的面前，是絲毫做不了障壁的。終久弄到像今日那樣的一望千里的大平原，產出多料農產物，這實是漢人的努力之賜。

中國人有以沒有子孫爲最大不幸的風習，所以爲了子孫，是不惜努力的。他們有這樣的良風。替子孫買美田，是他們的理想之一。因爲風習是如此，所以子孫繁盛，提著努力主義，勇往直進；野蠻的兵力以外什麼也沒有的塞外民族，到底不能堪其壓迫的。這是漢人的大威力，大長所。這些地方，很酷似近世的德意志民族。——鈍重而乏於直覺力，無趣味無風流，只是實際的意志的這些地方。

因爲性質是如此，所以其吸收西洋文化，也是曆法，軍隊編制等實用的科學的一部，及法制經濟那些東西；純文學及哲學等等，最近方才取入。中國開國比日本古，然而飾泰西文藝史的雄編大作，幾乎一點也沒有翻譯。這與我們日本比較起來，真不可同日而談。這些事情，也許是因爲漢人的遲緩性的關係；不過總之他們有好實利的學問的性格這事，是無可爭的。從中國來日本的留學生等等，也是不想研究日本的歷史，考察其建國的精神；並且討味日本文學，研究日本趣味的人，簡直可說是沒有。他們雖常常說什麼同文同種，然而絲毫也沒有了解日本人的精神。

他們學的，或爲學了馬上便是錢的物理化學；或修政治經濟，以爲做官的功夫。學科學，也是專好應用的實用的東西，理論的東西是不管的。

日用的器具等等，也非以實用堅牢爲宗旨的東西，不適中國人的嗜好。容易破損，及脆弱的東西，即使華麗優美，都是不適於他們的嗜好的。風流巧緻等等，是第二次的。同一商品，譬如與東京製的狹邊帽子比較起來，還是大阪製的闊邊的適於防大陸的烈日，所以這一種是容易賣得出去；不專以實用爲旨，中國人的買賣是不行的。

試看他們的家庭，裝飾等等也簡直是不成問題；是很不美觀的。牆壁，分間法，開窗法等等，都是簡單非常，千篇一律；只以堅牢爲專一。

要之，形成中國人的中樞的特性的，是專是中庸的，善將感情之冷熱二面調和下去，優於實用實利之才這事；和孜孜努力不已的努力主義。他們的步伐是慢的，就像大象的步伐一樣；不過他們的生命，便是在於努力不已這一點上。我想正是因

爲這點，所以他們比之直情徑行的，富於興奮性的智的民族，生命還悠久。

第五 論自利心

先天的尊重實利實益的中國人，隨着世之推移，因之可看爲所謂第二性質的自利心也發達了；在現今，有頗可忌的傾向。當然中國人未必個個都是利己心強烈的，不過一般看來，利己主義者是很多；爲公衆爲國家而獻身的是極寥寥無幾的。離了自利心，利己主義等觀念，簡直不能觀察他們。——他們充滿着這樣多的利己的材料，這是我們深引以爲憾的。

大概不是因爲中國人有實利性，所以便變成利己的性質；不過據我們推測起來，也許生在中國那樣的國家，是勢必至於變化到這樣。

漢民族的特質，是缺乏政治的手腕；所以亂世之時，多於平時之時，中央政府
的權力示衰兆的時候，便是羣雄割據的時候。并且他們的所謂羣雄者，其素質是不

能與我們日本戰國時代的羣雄比較的。他們的羣雄，是野武士，是羣盜。可說是犬猴而冠者，比比皆是；他們是以暴力劫掠人民，殺戮人民，風靡一世的人。他們中間雖也不是沒有恩威并行的英雄，不過大體這種英雄是甚寡的。他們的英雄的八九分，都是暴民的頭領，勝則官軍敗則賊，這便是中國羣雄割據之圖。

這樣的亂世來臨了，中國的良民便不知如何是好，便不得不送賄賂，供給糧食，派壯丁從軍。若忤其意，則他們的生命財產便都不得不化爲可憐焦土。一切或死，這是中國人從祖先屢次經驗過來的事實。

漢之末路，黃巾之賊，三國時代之戰亂，五胡十六國的侵入，唐宋明等各末期蜂起的羣盜，近則清朝的長毛賊及直至今日的內亂等等，大凡易朝革命的過渡期，常不得不蒙這種慘害。

中國沒有警察的權力。在現今完全防備着的，也還只是都市。他們不得不依自力守護一切。很要一點以警察權完全地被保護着的日本人所夢想不到的自衛的苦

心。水滸傳的英雄九紋龍史進，練武藝，教練村民，使取一致步調，以守護史家村，與少華山的強盜交戰。這事不應看牠只是小說的假託。現今的山賊構據山莊劫掠人民那種狀態，從前也是一樣的。所以中國人的主我性及自利性，大部分可以看作由政治的積弊而生，這種看法或較正當。

中國人似乎從春秋戰國時代，人民的性質漸漸變成個人的。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將利己的行爲卑下做小人做的事。然而孔子時代，還不是很利己的；論語中關於利的事寫得不多。似乎是到了戰國時代的孟子，利己的風潮方益加旺盛。孟子極口排斥利己，以仁義在當代作獅子吼；這可以看作已經不堪利己的風潮的弊害了。孟子見梁惠王，痛擊王之利己，這是很有名的話。然而孟子之仁德主義，誰也不傾耳，誰也不任他於國政；所以由此看來，似乎當時中國人已經很有主我的傾向，儒教的教理，似乎不過是形式的招牌。否，也有些地方能看到儒教似乎為打破中國人的利己主義而案出的。

反之，自商鞅至蘇秦，張儀，范雎，蔡澤等等，因為他們說述了國家的利害問題，所以他們中間，且有一人掛數國相印者。

孔孟以後，值得稱為哲學者的人，莫不是說寡欲的。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如此，他排斥了利己主義。大學裏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這些話實是憤於利己的弊害之甚的彈邪之言。

總之我們不可忘去養成中國人的自利心的思想是老莊哲學。本來這哲學是包擁着種種思想的，不過大別可分做兩個思想。一個是思辨的本體論，就是齊物論哲學。一個是代表實行的方面的養生論的倫理學。中國人是實踐的民族，所以齊物論是毫不了解的。反之倫理的方面的養生論，便毫無更改地收進了他們的處世法。這是其本性，是沒有法子的。這便如像希臘人將所有思想美術化，形體化了的一樣。

那末，這養生論是怎樣的東西呢？這是極端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全體人組成社會，所以理當是做對社會有用的人，而極端勉力；不過莊子思想却與之相反，他否定了社會組織其物。莊子上面列舉了種種巧妙的譬喻與例證，揮了他獨特的洗洋之筆，譬如說：『山木之被伐者，乃因其有用；膏之被焚者，乃因其明；皮很美的狐豹，乃因其美的被殺；出甘水的井，乃因其甘水而被汲。人也是因有小才而被用；功名德行等等，畢竟是自災之物。故達觀世中的宋榮子見其知也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登一國宰相，以爲天下無如己者的人，猶然笑之。』人應悠悠自適于無何有之鄉，以全自己；不爲任何東西所羈，應當是自由的。所以自己之獨立，自己之完全，自己之自由，自己之安全，這是其眼目。與近代的伊孛生託爾斯泰等的文學裏面表現着的個人主義的思想，酷似點很多。并且一面與無政府主義的相似點也不少。

儒教是社會集合主義，老莊哲學是個人主義的精髓；這哲學最重要的，是自

己。『伯夷爲名而死于首陽，盜跖爲利而死于東陵之上。得名譽和做盜賊，同是害自己天性的事。』：伯夷那樣的犧牲的精神及獻身的精神等教理，是莊子斷然排斥不取的。

從老莊哲學的見地看來，雖國家之重任，也是不能替代自己的一身的；畢竟天上天下最尊貴的，乃自己的生命。他們的哲學，實是這樣的自己中心主義的倫理學。莊子秋水篇裏，這種論旨寫得很妙。意思便是說：

『有一次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之使者來，傳達了王之命令，說願委以楚國國政。

莊子拿着釣竿，頭也不回，問使者說：『楚有卜國家大事的神龜。聽說已經死了三千年，所以王將牠納于箱中，留置廟堂。試問那神龜還是情願死而骨貴廟堂呢？還是情願生而曳尾泥中呢？』使者答說：『當然也許雖曳尾泥中，也還是活着的好。』莊子于是說：『那末我願曳尾泥中。』拒絕了楚王的招聘。』

天下國家，都難換自己一身。——這便是老莊思想的極意。這樣的譬喻，莊子

書上隨處都反復着。

在中國那樣盜賊很多的國裏，易朝革命的國裏，警察權不周到的國裏，老莊哲學之生起，乃極自然之事；他們因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的必要上，而其鳴于老莊哲學；以其處世法，為最安全之物。他們現今簡直有精都不剩地將老莊思想之處世法吞盡了之觀。

老莊哲學，不但風靡于中國的民衆間，漢初之名臣張良周勃等豪傑，都奉了此教。到了武帝，把牠與陰陽道相合了，與神仙說相和了；漢末之時，張道陵自蜀起，以此教理作為一 *system*，稱之曰道教，遂至施行種種儀式。

他們為要與佛教之藏經對立起見，組織了名叫道經的經典，與佛教相對立，而至成衆俗之信仰之中心。

到了晉代，其迷信達于極頂，有名的竹林七賢，真是極盡狂態；不過其自利心之旺盛，却又超過俗人，真是不得不擊蹙的。

到了現代，道教成了對中國民衆有強大勢力的一大宗教；除開了道教而論中國國民性者，不免有迂愚之譏。在現今以古代中國思想爲對象而論中國國民的時候，則儒教乃單是在形式方面，日常儀禮上面留一點痕跡，墨教則潛形于商業上的組合組織中，而道教則是一般人民的宗教，支配着他們的精神界。

所以迷信與自利心，道教與個人主義，乃成了結着于中國人的膜網上面的不易分離的東西了。我們前年受了滿鐵的上田恭輔氏的天福安樂經的寄贈；這書是現今中國人朝夕服膺，以爲道德的標準的善書之一。這善書等等也是道教的經典之一；上田氏的序文上面，斷言着說：『使中國民族的道德觀念保持的，乃是道教；使中國民族墮落的，也是道教。』又說：『使曾是純潔如玉，誠直如幹柱的民族，變成迷信的而我利愛錢之徒的，是張天師以後的道教。并且又軟化了中國民族的氣風，使抱一種厭世的觀念的，也是張天師以後的與佛教思想混和了的道教。這是可以斷言的。』這實在不得不說是一面的真理。

這些經裏面，有警世功過格者。這是說判斷日常自己的行爲，記下善行惡行，以定其功過。譬如說親柩不葬五百過，救一人之急五功或五十功之類。這也是可見中國人的打算的善行的好資料之一。他們的善行，也是從自利心打出來的算盤。

中國人因以這種思想而被教化了，所以賭國家的大戰爭，屢次可以金力而決勝敗。漢之陳平，從漢皇那裏受了黃金四萬斤，所以離開了楚之君臣；這尤其是代表的。宋明滅亡之時，也間有從敵國之王那裏受了賄賂，殺害忠義之士的事例。明朝滅亡之時，劇賊李自成欲攻掠北京，皇城全被包圍了，思宗皇帝在北京城上勅兵列，努力防戰，危機正切迫，而國庫金也不多了，不能給兵卒以特別賞酬，所以請求了內帑金。然而自皇帝至皇族重臣，大家都不很高興出軍資金；有百萬之富的，僅出一萬或二萬。皇帝遣使者，向當時的富豪們徵集軍資金，很多都是託故只出一點。所以兵士也因之而不努力防戰了。因之北京被攻掠了，帝也殉于難了。——他們即使國家滅亡了，也只是「沒法子」「天命」地斷了念；唯有自己所有的金錢，

不納入壺中而藏起來，則死也不能瞑目。他們的一般風習似乎都是如此。

君臣之義，忠信等孔子之教，是絲毫不見有；他們一直到骨髓都是惟我論者（Egoist）。清朝末路之際，也是與明朝一樣的。滿人也許不能便稱做漢人，不過在今日，是被漢人完全同化了，大家都是應數在「中國人」這大傘之中。

清朝覆滅之際，悲憤慷慨，雖也有吟中國人一流的悲歌的人；然而他們的皇族重臣，是以如何態度當事的呢？他們的多數，以自家之安全與皇室之優遇為第一條件，都向革命軍降服了。有誰爲了滿洲朝廷盡了最後之節呢？滿洲朝廷倒毀之日，我們沒有聽說有一人殉于忠義之節。當初革命興起時，募集了軍資金，期與革命軍決戰；傳說有千萬之富的慶親王，只拿出十萬左右，其餘很多或在自家門上貼賣家條子，或賣骨董與馬車，以向公衆暗示其所有金之寡少，以免獻納多額之軍資金。

由來中國的所謂朝廷或皇帝，根本都是以民衆之力而推立的大總統；是爲了自

己的利益。所以暫時推戴的，時運不好時盡死節等等，中國人一般心理，都是將他們看做不知時勢的愚人的。他們的血脈中，流着極端的自利的民主思想。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是不用說，就是『王侯將相，何不有種也。』說這樣話的人，也不止是陳勝吳廣。

宋太祖那樣，是被士卒強迫而做了天子的。據史傳上說，宋之太祖，任于周，領宿衛。時恭帝即位之二年，主年少，國家受契丹之侵略，非常危險，太祖稟契丹防禦之任，出陣至陳橋驛，天象有異變，據史傳上說，是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此時太祖之部下，以爲是太祖將爲天子之瑞兆，蒙太祖以天子的御衣黃袍，羅拜而連呼萬歲。遂強立趙匡胤爲天子，迫恭帝讓了位。這便是宋太祖做了天子的原因。這些豈不是士卒打算自己的利害而推立的大總統嗎？中國的二十四朝，嚴密地講來，這種天子占有大部分。

所以戰爭不利時，倒戈

，并且似乎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向故

主拉弓等等，也不算什麼的。

中國近來的武將，若說到張勳，他乃是被中國朝野所虎視爲一方的驍將的蠻勇的大將。這張勳傲語說要飾清國的最後，而宣言了宣統帝的復辟。當時列國都以爲事成則好，事不成必將得一堂皇之死的；那知期待雖如此，事實却正反對，張勳見戰事不利，在戰爭正烈之中，部下將卒塗血流汗防戰之中，他却借了外國人的援助，脫走本營，逃進了荷蘭公使館。中國人無論怎樣長於利害打算，然而他到底是一個軍人，并且是被冠以蠻角稜稜等形容詞的軍人；以這樣的軍人棄了部下，捨了主義，去躲在外國人的袖蔭後面，這是何等的醜態呀！

中國的軍人，平素有一師團的兵數，總是吹做二師團的兵；有一旅團的兵，常是號稱二旅團。自古中國人的兵，多是這樣；這是盡力將兵數報多，向政府要求軍費的自利手段。如此從政府發下來的金額，按着兵士的人數分配了；空的分，則進了自己的腰包。軍隊檢閱之時，則在其期間中驅集百姓們，以補足定員。來檢閱的

那一般傢伙，不是同穴之貉，便是極文弱的將軍，所以毫無露見之憂。他們檢閱使們，大率也明白其間消息的；所以只要拿着了錢，總是「嗯，行了，行了」地完事的。其爲軍人還是商人，這些地方是難於分別的。

軍人尙且愛錢如此，所以到了中國的官吏，那簡直毫無異於辛辣的商人。最有利益的職業，是官吏，這是一般所公認的。無論怎樣的州縣，知縣的候補至少有五六名，甚至有十數名，大家都等着自己做知縣的順次輪到；所以其中情形，大抵也可以想見了。并且做中國的官吏，有一種別國沒有的官吏登用法（此等之法，民國以來，也許多少有了些變化，）這叫做「倚途出身」，乃按獻納金之多寡，而買得官吏的資格之法。還有叫做「正途出身」的，乃依自己的實力而得，便是如受了鄉試，科舉而出身的官吏，這與別國的官吏登用法是沒有兩樣的。（當然這也是中國的事，所以雖說是不要錢，實際大概多寡也要一點的罷？）別國所沒有的便法，便是倚途出身；依這出身者，雖不能買得過高的官，不過據說立身大都比正途出

身的還要快；所以可見中國社會裏金錢勢力之大了。總之他們是有這種珍妙的官吏登用法就是了。

中國人民，被這樣的官吏所治，所以官吏與人民，高官與屬官間之賄賂，是公開的祕密；義理等等決無徹底之理。有金力的人，贈賄于上官，以謀立身之道；沒有金力的人，便不得不永久甘于下級官吏。所以以種種名義，做捲刮人民的金錢的功夫；譬如說徵收租稅的時候，到鄉間去的官吏，常在租稅以外徵收辦理費及其他。并且因為有租稅告知書而無收據，所以兩重收稅的事也屢次做；若言不服，則後日更將吃苦，所以人民普通總是忍氣吞聲作罷。中國的租稅，米納雖是原則，然而也有時候允許錢納。這時候米一石合銀幾兩，是不管市價，行市是官吏隨便定了徵收的。徵收地租的時候，一一以天平秤之，銀質之良否，是官吏任意定其價格的，并且在量和質的方面，又還作假。

訴訟之際，沒有金力的人，無論怎樣有理，是不能勝于有金力的人的。俗話說

得好：『衙門中南開，有理無理拿錢來！』要訴訟，第一必贈賄于知縣的看門人；不然則阻不轉達于知縣。訴訟被受納了，則因審查期日之長，原告被告兩造都不得不贈賄于吏役。吏役若知道原被兩者之一或其親戚是富有之人，則審理愈加延滯，愈加擴張其範圍，以增多肥官吏之私腹的機會。原告則因欲勝訴而贈賄于吏役，被告也因欲早日完結，所以也贈賄于他；所以吏役從兩方受錢，是非常得意的。并且與原被兩造沒有關係的人，也以證人的名義而被召喚；他們因不願立于法庭，所以也贈賄于吏役。就是這個樣子，起了一回訴訟，原被告都要用多大的費用；中人之產，往往有因之而盪盡者。案件若是殺人罪或金錢田地價格大的時候，賄賂之額也隨之而加大，所以沒有金力的人，總是揮淚以爲是所謂天命，而斷了念。

要入牢獄的罪人，只要有錢，刑期也能縮短，在獄裏也不要什麼勞動。只要贈賄于「管營」，「節級」等獄裏的吏役便行了。拷問的時候，也只要贈賄于吏役，他總會代你設法的。譬如說答刑的時候，則答之使用上總會替你想一點法子的；又

譬如說跪鐵鍊，因為鐵鍊是扁平的，所以立起與鋪平，受刑人的苦痛是分顯著的差異的。這些都是因金錢而施以分量的輕重的。沒有錢的人，雖是薄刑者，也不得不被投進以不完全出名的到底非人類能住的穢陋之室，終日服苦役。牢獄之狀況，現在也還是同水滸傳裏的記事一樣；有錢者則被獄吏無限地榨取，沒有錢的時候，則虐待無所不至，終因之而牢死者也不少。因上官命令或他人的委囑，獄吏虐待入牢者，以致其死，這便同因高太尉之命，想把水滸傳的豪傑豹子頭林冲焚殺于馬糧場的一樣。盜賊等等，其同類之一人被捕時，聽說有時贈賄于獄吏，殺之以滅其口，以免露風聲。水滸傳上林冲入牢的記事，將中國獄吏的拜金性，平面的敘述了，毫無遺憾。

「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牢城營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默視，却有一般那一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便覷的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撇在土牢裏，

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人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衆人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與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個是新來的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拿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個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却來唱諾，你這廝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是大刺刺的，我看你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把林冲罵得一佛出世，那里敢抬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林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差撥哥哥，些小薄禮，休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都在裏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林教頭，我

也聞你的名字，端的是個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總賴照顧，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值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有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冲歎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

水滸傳是把中國的國情國民性最如實地表現了的小說，這樣的牢獄記事，到處都描寫着的。

這不唯是下級官吏及獄吏，官愈大賄賂取得也愈多，所以中國的大官，一齊是大富豪。有名的李鴻章，袁世凱，都是有錢的人。在中國，英之彼得，日之西鄉南

洲那樣的清廉的大官，簡直全然是找不到的。

因為是這樣，所以中國古來（自隋朝始）設有本省迴避之制。這完全是因中國官吏急于營私利而案出來的制度。這制度就是，爲官吏者，上自總督巡撫那樣的大官，下至府州廳縣的雜役，不得在本籍地及寄留籍所在地的省內任官。又即不在自己本籍及寄留籍所在地，亦不得在五百浬里以內距離的地方任官。——當然中國官吏裏面，也非全無清廉的循吏，中國歷代歷史上面，也都載着循吏的傳記，不過數目上面，這種循吏不過是九牛之一毛。這是很可憾的。

荀子在二千年的古昔，喝破說：『有治人，無治法。』司馬遷在史記的貨殖列傳上面，罵說軍人之猛勇，任俠之俠氣，吏士之勵文筆，全都是爲了利己。我想這決不是偶然的。

站在社會之上流，執行行政的官吏尙且如此，一般人民爲錢而盡的努力，當然是我們所料想不到的。氣質兇猛者，則被人雇爲刺客；殺殪政敵等事，是很多的。

袁世凱那樣，懸千金于南方志士之頭，殺害南方之志士頗多。不只是袁世凱，南方的頭領，也投萬金于世凱的頭的。這些都是事實，並不是假話。古來懸金錢于敵人之頭的事，真是不勝枚舉。尤其是罪人逃亡的時候，適用這方法而奏了效果。這些事是人民中稍有氣力的人做的；至于下層民之懦弱，是可憐的，他們爲了金錢，什麼事都幹的。他邦人只要到過一次上海，大概便能知道了。我們不忍細說中國下層百姓可憐的境遇之下，一面活着，一面苦着，只憧憬着金錢的光景。

中國的政治家，了解人民這種風氣，所以規定了對他們適用的獨特的法律，努力舉其實。就是，譬如說毆打創傷的時候，則加害者須與被害者以治療看護。恢復被害者之健康體，或醫好了創傷，則加害者可免罪。若反之，被害者死了的時候，則加害者將依法處罪。中國人的利害打算之念是世界的猛者，所以總是百方盡力，注全力於被害者之快癒，所以政府方面也省事，是利益的。只要是利益，其餘什麼也不要緊，不一定有設深奧的法律必要了。

中國人一般都被說是懦弱，實則事若關自己的利益問題，是很強頑地抵抗的。中國人一般都被說是保守的，實則有利之時，是猛然突進，不一定墨守舊習的。中國人一般都被說是沒有團結心，是個人的利己的，實則有利之時，是一致團結，雷同附和的。其他如祖先崇拜等的中國一流的道德，也多寡有一點從利害關係打算的傾向可以看見。

中國人一般是沒有勇氣的，中國的兵士，聽說聽見槍聲便逃亡；不過日俄戰役，我們日本的海軍封鎖了旅順口的時候，中國人從山東省一帶乘着一葉民船，滿載食糧，常時突破了我們的封鎖：這是很有名的話。據實在看見的人說，那不像在大陸看見的因循姑息的中國人，其機敏，勇氣，精力發揮，使大家非常驚嘆。當時旅順，生肉野菜比武器還要缺乏，所以運氣若好，能到了目的地，則可得莫大的利益，在金錢面前是盲目的中國人，冒了諸般危險，賭着身命，極出沒變幻之妙。所以我軍不得已而按國際公法上的規定，而取了斷然的處置。他們的密輸入船被我

們海軍捕拿着了，他們便哀訴號泣，只管求免。及至我軍表示不饒，則暗將銀塊送與我們的將士，還是乞赦。我將士大怒，將銀塊拋於海中，他們於是馬上又稱讚日本軍人的清廉與義氣，願以滿載的物品分做兩分，一分送與日本軍，一分作爲己有，還是照樣地乞免。至此，我將士大喝曰：『破封鎖者，照軍法斬殺！』他們於是演出了匍匐號泣的愁嘆場面，這才斷念了船貨，專望饒死。——並且據說他們或在彈子飛來飛去的戰線外經營商業，或在海陸都是砲煙彈雨之間專心捕鯛，我軍望見了他們，畢竟也都一面憐其無智，一面感嘆其營利心之強烈。

中國人有什麼事都專講實利與自利的性質，所以商業方面，是很拿手的。商業上所必要的寬大和忍耐的性質，是充分所有着。中國人別樣事情是很遲鈍，唯商業方面則非常機敏可驚。中國人別樣事情是很說假話，不守約，唯於商業上則非常有信用，確實。他們只要能得錢，體面，主義，意見那些麻裏麻煩的事是一概不講的。只要能得利益，則低頭忍辱。官吏，乞丐，都沒有分別，有錢便賣，愈賣得多的。

愈喜歡。他們的性質，做僅僅一二回的交易，都是悠然定性，雖費半日亦不厭。忍耐力頗強，簡直同破壞了人間感情，做着機械的活動一樣，所以商法實不得不說是他們的得意之業。然而雖說是中國人，無論怎麼到底總也是一個人，他們也不是無感覺，有些地方，似乎比日本人等等的感情還銳敏。他們到這步田地底忍耐，忍侮辱，捨意氣，抑制感情，畢竟只是爲了要得金錢；是爲了自利的強勢，打勝了一切的感情。

中國商人，是組合制度，是非常重信用，所以比日本商人等等是有信用，是確實。不過這種確實，也還是從自利心打出來的算盤，是利己主義發達了的東西。若違反了這組合制度，按組合的規定，此後再不得從事商業的，所以不信用，便是自己破滅；所以實則是從自己保存上生出的自利的動機，不得不說是後天的確實性。

對有這樣性質的中國人，想以拳骨懷柔之，是至難的事。（意思便是說，只要以利誘之，什麼都容易辦的。——譯者添足）尤其是像現代那樣列強環視之中，不

能用兵力的時候，是更難辦的。

第六 論保守與形式

論中國人的保守性的時候，勢不得不說一說他們的形式主義。我對這事，費了多少考慮。本來打算將牠們分開略說一下的，後來我覺得將不免徒使思想混亂。中國人的保守與形式，形式與遲緩性，是相倚相密着，不能分離；所以這裏還是一括而論之。

中國人不是純然保守主義，佛教來了則將佛教攝取而吞盡之，基督教來則信基督教，是這個樣子，不一定便能將他們看做保守的。又譬如有利的事業的時候，則以脫兔之勢，破壞舊制。據說現今留學于歐美的學生那樣，是全然歐化了，中國人的性質更難看出，哄稱着什麼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其時髦出於豫想之外。近年革命戰之際，關在深閨的中國的少女們，組織起什麼娘子軍，真不得不說是青天霹

麗。

然而以冷靜的眼睛普通地觀察起來，則他們性質之爲保守的，實無可爭論。并且這與生來的遲緩性結合起來，而形成了形式的，不徹底的，妥協的，一種異樣的性質。

中國人開口便是稱堯舜，以周公孔子爲木鐸。他們這樣以人類進步的理想，不置於未來，而却置於過去，這實是證明他們是先天的保守的的資料之一。被稱爲中國教學之祖的孔子，是不用說了，如老子墨子，他們的教祖，都不出於三皇五帝之範圍。制度文物方面，周代的制度，現今尙多活用着。其他自政治教育至日常百般之儀禮風習，墨守三千年來的傳統的，世界中只有中國一國。這只要看泰西的中國學者，如來格，如希爾特，大抵都是不怠於徹底地研究中國古代風習的；這也可以證明中國人是怎樣固執往古的民族了。就是因爲不研究古代風習，是不能了解現代的中國人的。

中國人的保守性所以養成的後天的原因，是因為居住在他們四周的人民，簡直完全是野蠻人。文化卓絕四隣的中國人，自尊心很強，自負自國的文化，以自己的文明，確信為絕對唯一的權威，而極力維持保存之。這是養成他們的後天的保守性的第二次的東西。然而，在受了歐美文明的刺戟的今日，受了白人數次痛擊的今日，殆無完膚地受了侮辱，自負的鼻柱折了的今日，中國人無論是怎樣保守的，也不得不發奮而易風革新；然到現在尚未就緒，是因為什麼呢？這實不得不說是因為中國人有遲緩性，有悠悠閑閑有如象步的性質。

先觀察教化他們的儒教吧。孔子是周代文明的大成者，同時又是牠的宣傳者。他的精神最集中的，還是古典的研究。他讚美周代文明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錯這一方是說溫古知新，并且孔子自身抱經國之才，以政治為自己的天職，簡直終身沒有捨棄這希望；不過其教理，還是近於

保守的。其尊禮樂，據說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遵先王之法，未嘗誤之。他是這樣地嚴守了古來的禮儀習慣。大凡世愈進步，而世事亦愈複雜，而生活之樣式亦漸異，這乃自然之理；古來禮法習慣，也不得不自然地順應時代，而行變化，這也是自明之理。孔子在世中，他的弟子中也有激刺的英士，想改革古習的似乎也有。有一次子貢曾問孔子說可否去告朔之餼羊，（告朔之餼羊者，乃諸侯每月供牲羊，告歷於廟之禮。）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而反對了。宰我愛三年之喪期失于過長，將這事問于孔子曰：『三年之喪，期已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其可已矣。』孔子答說：『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宰我答曰安。孔子乃曰：『汝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這三年之喪等等，心身都很疲弊，并且經濟上的利害也頗甚，所以當時有用之才，俱不服之。對死者用相當之禮，乃人情之常，中國人那樣的祖先崇拜的

國，這種情形也許是當然的；不過父母之喪，祖父母之喪，其他一直到兄弟姊妹等等，都要守嚴重的喪制，則僅僅五十年的生涯之中，自己活動的時期也許都過去了吧。一般人民若都反覆的行漸衰三年等喪，則一家的經濟將成功什麼一種狀態呢？這大概不待智者便能大率想像得到的。那末孔子這些回答，是不得不看做只是拘於一種傳統和感情的。所以子貢宰我等等，似乎是以爲這種形式的傳習，因爲沒有實質，所以應當竭力改爲短期，而要真是從衷心地哀悼。

然而孔子畢竟是可爲萬人的龜鑑的世之師表，他對子貢宰我的質問，也專取道義的說服的態度，而不是命令的。

到了孟子，他却簡直以爲禮這事有確乎不拔的真理一樣，簡直是命令的。他說：「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孟子以先王之教——禮的制度風習，爲無上的權威，而唱導了其威嚴。

從這儒教至前漢孝武帝時成了國教以來直至今日，歷代朝廷的儀式典例以至政治法律的萬般，只要是上流社會的形式的儀禮，都墨守了儒教的舊制。一般民間，慣例的儀式風習，也保有了三千年的傳統，及於今日。中國古代史的著者希命氏說；『中國人國家是不很融合；然而他們在儀禮風習方面，守了周公孔子之教；因這風習，中國人於是體現了一個社會。這個光景，在別國是不能看見的。』

所以在中國，易朝革命之後，法度政策理當是不得不革新，然而事實上却諸事一仍其舊，前朝的法制照樣不動，僅重新彌縫追加一下。唐踏襲隋之典例，宋取法於唐；便是這種做法。更沒有根本的改革，依然是周代之制，不出禮之範圍。

以有如此性質的中國人為背景，雖非凡的政治家，大概也很難斷行其所信。中國的歷史中，看來似乎出了不少偉大的政治家；然而以絕對尊重古習的人民為對手，執行創造的政治是不可能的。天才政治家，常因頑迷的保守黨而蹉跌。前漢之

賈誼，乃年二十二而超遷至太中大夫的早熟的天才。（英之彼得，以二十四歲的青年登了宰相之位，這真是東西好一對）漢興至孝文帝二十餘年，賈生想盡力改正朔，易服飾，制法度，定官名，與禮樂，所以想把秦之法完全更改了，所謂想斷行法制上的改革。然而受了守舊黨的元老周勃，灌嬰，馮敬等的猛烈的反對，於是被貶謫了。並且其彈劾事項很是感情的，只說是『賈生以年輕之身專權，將諸事弄得非常紛亂，真乃冒失之徒。』這種彈劾案，大概都是以感情始終的，這實是頗應注目之點。

宋王安石，雖有這樣那樣的批評，然其為中國有數的大政治家，這是無可爭的。並且據說他博學多文，下筆如有神，不要一字推敲。其性格是自信頗厚，固執自己所信，勇往邁進，傍若無人。當時乃宋之最盛期，人才雲集，英才星列；賢明的神宗皇帝，年少氣銳，精勵於政事，所以拔擢王安石為相，以興富國強兵之策。

安石總攬了政事，在中國斷行破天荒的改革，所謂王安石的新法便是。他以保

甲保馬二者爲強兵策，行青苗，募役，市易，方田，均稅法四法以爲富國策。然而這個尙行未期年，新法之善惡還沒有分明的時候，舉朝便都囂然鳴其非。因之司馬光蘇軾以下被免官者數十人，所謂是元祐的朋黨。多數學者，都加以辯難攻擊，說安石是變法度，引用兇邪，使宋之天下危殆了的小人的首魁。

當然安石的新法也許有不備之點，不過也大有可取的。尤其是在教育制度方面，覺悟了科舉之弊，想把科舉全廢了，而擴充學校制這識見，在當代實不得不說是嶄然拔羣的卓見。我想若教育制度之革新，由他實行了，則中國民族的進步發展，當大有可觀。光緒帝時的科舉全廢，在安石提議後八百年；由此可以想見中國人的進取革新的氣象是如何缺乏了。

安石的新法，也還是背反了中國人的保守的風習，他們忌嫌「制度革新」如蛇蝎，所以非議新法，也簡直完全是主觀的感情論。就是反對派的領袖，也只是哄稱新法之不便，沒有人能以至理批評其根本的地方，只是盲目地急於撲滅新法。至其

末輩，只不過是附和雷同而已。

如上述，王安石的新法，和神宗皇帝的早逝一同被保守黨所完全破毀了。在近世，主張與王安石同樣的改革而簡直遭了同一運命的，則有康有為（南海）。是廣東，生在很早便可受西洋思潮的感化的土地。古代的孟子上記載着的神農學這農業社會主義者，近代的王安石，現代的康有為孫文之徒，都是南部中國人。南部中國人比之北部中國人的保守的；很是進取的。在近世思想界劃一時期的朱子，陸象山，王陽明，顧炎武等等，都是南部中國人。尤其是嶺南地方，很早便同外國人接觸了，所以受了新思想的影響的是很多。他們裏面有一種人，是多雄飛世界的大胆的商人，所以外國話說得好的是不少。南海便是其代表者的一個。

他有非凡的文才，他的豐富的思想，表現而成明快的文章。用以鼓舞容易一時地熱起來的中國青年的人心，是無不足的。他看了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慘敗，憤自國軍隊之無力，在光緒十四年，以布衣書生之身，痛論國家之大計，伏奏之於闕

下。他研究了日本的維新歷史，見其因根本的革新而確立了立國的基礎，他於是概說了清國朝廷亦不得不學日本的維新，這便是有名的變法自彊的改革案。上奏此案於常路的，是在中日戰爭的前六年；然而當時的保守的中國的當局者，輕信了列國的諛言，李鴻章的新兵制和新器械的購入都中止了，自負於自國之強大，裝得強得不了；在這樣的照例的驕慢病時代，當然對一書生的上奏文等等是不顧的了。

這時中日戰爭便開始了。中國本來是以爲弱小的日本不足爲患，可以一蹴而去的，那知連戰連敗，大砲的威力，倒還是在青龍刀以上。傲慢的鼻柱，於是被完全拆去了。南海的先憂，着着成爲事實了。

這時候光緒帝及其周圍的稍進步的人間，方才開始傾耳於他的說策了。然而一八九七年上，被德國占領膠州灣，在這以前，則被俄國租借了旅順，英國租借了威海衛，漸漸現出了分割中國的氣勢。畢竟遲緩之極的保守的政治家，也不得不以睡眼朦朧的眼，認南海之策之必要了。於是帝及南海一派，着着進行，以期實行變法

自強之策。然而頂戴着皇帝的革新派與以西太后爲首領是守舊黨，因此成了互相睨視之勢，暗鬪也很劇烈，康有爲一派，終不得不照例陷於沒落的悲運了。

賈誼，王安石，康有爲，中國代表的改革家，常被保守黨破碎了，這都是因爲與中國人的保守的性情不合的原故。中國的改革，是遲遲應待諸一般人的推移的；日本那樣的改革，大概永世不可能的吧？

今日的中國共和政體，名目是很時髦的，然而舊皮囊盛新酒，其內容是悠悠閑閑；中國一流的自利與遲鈍相綜錯了，單是形式的變法是徐徐進行着。到什麼時候方能真的有革新呢？只要他們的教育的訓練不脫這保守的陋習，我想大概是不得不悠續此道程的。

如前面所講，中國人對政治的改革，是有絕對反對的性質的，并且他們同時有這種奇妙性質：若要變他們的風習，是賭死守護的。宋明等朝廷滅亡的時候，忠節殉國的人們中的不少人，都是因爲敵國是夷狄，不樂移其俗，所以奮鬪到最後的。

孔子賤視了管仲的功烈，然而對管仲的防北狄，使中國人免了被髮左衽的文明的擁護，則非常拂了敬意。

明末抵抗清軍，其理由的大部分與其說是爲明之朝廷，毋甯說是怕被強留辮髮。韃靼戰爭記的作者馬金·馬基尼氏說當時在浙江地方目擊的事情，據說：

「滿洲軍沒有怎樣抵抗，便占領了紹興府。然而他們強制歸順的漢人蓄辮的時候，一切的漢人——兵士，市民，都拿武器而起，與其說是爲國家爲皇室，毋甯說是爲保護自家頭上的毛髮而賭着身命抵抗了清軍，終把他們擊退於錢塘江以北之地。以前怕殺頭從順如羊的漢人，現在却爲欲保存其髮而如虎一般地奮起了。」這是假話般的事實。所以胡朝的政策上，常尊重漢人之風習而懷柔之。

所以先例簡直是他們的規則。若說「這是古來的先例」，則大抵的事情，都能容忍承諾的。漢之王莽，便是將這民衆性巧妙利用了的姦物的一人。他萬事都是模倣昔之周公的言行，終久籠絡得了民心，篡奪了漢之天下。便是，周公旦曾因周成

王幼小的原故而攝了政事，王莽擁立的平帝是幼小的，所以他學了周公的故事。

當時爲莽上書請行九錫之儀者四十八萬七千餘人，三公及宗室，都叩頭說宜加賞賜。這也許是從他們的自利心畫出來的計略，不過另外一面可以見得其容易拘於故例的性質。

魏之曹丕，以堯舜之禪讓的故例爲循，受了漢靈帝的禪，晉武帝也重做了一遍同一的事，而受了魏的禪。就是，有權力的悍雄，至利用中國人這種性質以供粉飾自身之非。一般人民，則似乎只要形式合於古例，善惡的判斷等等是不拘泥的。

若再看一看思想界，有了一創見，則株守之，創見之進化是少有的。譬如中國人研究論語，也只是考證其文字之差和文句之異同等等，組織地概括一篇的思想而研究，是罕有的事。否，簡直是絕無。這是可驚的。若再看一看日本人，則不惟組織地研究了，并且還改造牠，應用牠，作爲自家藥籠之物而研究牠。中國人有看改作古聖人書爲一種罪惡的傾向。中國的學者古來註釋論語的東西，單是傳於今日

的，便有幾十家。其研究簡直是千篇一律，大有屋上架屋之觀，這是學者們大家所認識的。我們對其學風之單調而是形式的保守的這事，實不得不啞然。

形式

因為是保守的，所以當然是尊重形式的。中國人非常尊重古禮，在周代，禮之制度已大體成立。古之禮的範圍，是廣汎的，周禮那樣，乃關於法律制度的，禮記是關於禮的理論的，禮儀是關於公私的儀式禮法的，這些總稱之叫做禮；今日之政治法律以至於文物制度宗教之儀式以及一般儀式的末節，牠都抱擁着的。所以若要不實行之，則未免過於嚴板了。所以孔子將樂看做與禮是有同等價值的東西，努力以樂和形式的禮，以養成和樂的氣象。不單是孔子，中國古書之欲藉禮樂二者并行以整頓社會調和人心，這乃歷史的事實。然而樂是難存於文籍的，所以古樂到戰國時代末期，簡直是滅絕了。禮一方面，則關於法制的與關於儀式的部分漸漸分離

了；後世之所謂禮，變成了司冠婚葬祭的儀禮的意思了。

如此，古來伴於禮的樂，不被看重了；失了樂這重要膏味的禮，便和失了牠的精神一樣，弄得只剩了一點嚴板的形骸了。

這形式的儀式，現今大體還是守着古來的風習；然其精神，比之古代，實是非常稀薄了。譬如說，父母兄弟死時，則行哭禮；這是古來的儀式，乃父親或兄弟死後限在或期間或時刻放大聲慟哭之禮。旅行中國內地的外國旅客，時時能遇到這叫聲。這并不是因其不勝悲哀之情而哭的，近來據說是雇了「哭喪者」——以哭泣之禮爲職業的人——而叫他哭的；這全然是極端的虛禮，真是暴露了中國人的形式癖。

冠婚葬祭等禮儀不用說是很難，就是普通的禮儀，其煩雜也可驚；敬禮的方法，也有種種樣式。普通的敬禮是拜。拜之種類有稽首，頓首，吉拜，凶拜，褒拜，肅拜等等的方法。對於上官等等的禮是三拜九叩首，真是非常鄭重的。日本雖然在信札的末尾寫什麼頓首百拜，然而近來大多只是再拜便完結的。在中國據說

是實行着的。訪問別人家，第一脫鞋有脫鞋法，坐也有坐法。侍長者時，則脫履於堂之階下。弟子對先生的時候，非先生叫你坐不得坐，否則便是背禮。飲茶法，吃飲食法，俱各從其規矩。登階級也有方法的，不能亂登的。普通的登法是連步，是每一段并攏雙足徐徐登上去的。從前孔子相魯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的時候，齊之君臣欲脅迫侮辱魯公，孔子聞之，歷階而昇。史上是這樣記着的。這所謂歷階，非十分急時是不行的。然而歷階普通是我們的登法，是左右足相前後而昇的。中國人以這種登法乃不合古禮，而排斥之。「越禮」等等，那真非危險之時是不做這種無禮之事的。這些不過單是一例，其煩雜之事，真是可驚的。所以形式的儀禮的整然，和關於禮的典籍之多，乃世界獨步。看他們的住宅，其建築也是千篇一律，其貴賤之差，只是在形之大小。他們的家，大體劃之爲方形，從左右前後造得能取調和，總之是極乏於變化的構造。他們日用品方面也有喜歡方形的東西的傾向。不過這不一定便只是中國人如此，東洋人一般，自來比西洋是多使用了方形之物。

比這些事實更多形式的，便是他們的文字，他們的文章。文章之中，尤其是駢體文和八股文等等是其代表的。四六文是從中國的南北朝到唐朝初年流行的東西，是後世莊重的時候用的文體，就是譬如說『青山』，則下面對之以『白雲』，說『三江』則對以『五湖』，是這樣取對句的文章，詩裏面的律，也是由對句而成立的。尤其對句在音調上也非常麻煩，又文字之形式，也是非常之難的。這形式的對句，在單音的中國文字方才有效；複音字的時候，因有長短之差，所以不能發揮效力。對句之特色當然是因文字之性質的；不過總之中國人的尊重形式的風習，是在詩文上表現着。他們的詩裏面，往往插入有意思等等全然不明的不得要領的文句，以調和一篇之形式。這是因期形式之完全，而戲弄了自己的思想；司馬相如一派的賦，便是其好例。

八股文是應科舉者必修之文章，若不能學這種形式，則不能登進士之第；便是這個樣式。中國人表現暗記了形式的文章，是有特殊的文才的；然而把自己學的學

問論理地創造，這却是舉子所最困難的。這事最先注意到的，還是宋之王安石。他說：『詩賦僅雕虫之末技，明經乃學究之事，宜易以經義論策。』然而受驗者的舉子，一個人也沒有應用經義作自家藥籠中物的才能；所以據說王安石也畢竟痛嘆了。

這是表示中國人的頭，不是積極的活動的而是消極的表面的，全然缺乏創造的論理。八股文是使中國的官吏愈加變成形式的文體；他們似乎相信只要文章通于形式，那末名官吏便算成功了。

這愛好形式的對句和漂亮的文的性癖，到處被應用着，親戚朋友或長官家裏有慶事等等的時候，普通都用紅紙寫上吉祥的文句去送他去。人死亡的時候，則以白紙寫上弔意去送他去，這便是所謂輓聯。譬如說澡堂的浴場裏，則寫着什麼『文沐身狀元及第，武浴體掛印封侯』（這是貼在獨人浴槽的官堂裏的），以作浴客之慰藉。

官吏若至首都以外的地方去，是排起行列而進行的；這又是躍過了形式的這事，毋寧說是滑稽。這些事，民國共和之後，也許要自然消滅的；在前清時代，是銅鑼，大鼓，提燈，傘等等，搖着響着而排隊前進的，前面則有人舉着「肅靜」「迴避」的牌子，意思便是叫人民應對他表敬意。二十世紀的今日，行着這種形式的「大名行列」（日本從前諸侯的行列——譯者註），這種國民也真悠長呢！

這種形式性，行政上法制上都表現着的，譬如說，制定小學校制度，無論那國都是先建起小學校制定小學令的，只有中國一國，小學教育還沒有完成，從小學令至大學令便都一次制定了，但乎非這樣不安心似的。形式比實物實行，都是緊要的。近來中國南北之隔離係爭，也都是什麼守約法不守約法的形式的背忤，至于中國全體的世界的地位等大問題，則再也沒有想到過。簡直便是這種狀態。

中國人自古便非常重視體面。他們送歲幣于夷狄，平身叩頭，僅以避其鋒；然而名目上只要以自國是哥哥輩，呼敵國為弟弟輩，那便算心滿意足了。這事是中國

的自古至今的套襲下來的政策。

宋徽宗皇帝時，金兵曾分三路入寇，而攻下了燕京。金人是熟知中國人的虛飾的性質的，所以遣使者去說，燕京是以金之兵力攻下的，理當是金國的東西，然而現在只要將燕京的租稅收給金國，那末土地是用不着的，可以還給宋國。宋之使者趙良嗣與議之，在舊歲幣之上再增加了歲幣，此外再加百萬銀，以作燕京的租稅，而求了雲中之地。金人諾之，只得了一點土地而回去了；回去的時候，席捲了燕京的金帛子女，職官以及民戶。宋人得了空城，維持了體面。近代的對外政策，也是與這個大同小異的，只要體面不壞，租借地問題等等似乎是沒有問題的。當然在義和團以後，似乎稍微覺悟了一點，不過只要體面不壞，也許還會做出任何非國家的事情的。

這體面——拘泥于形式的風習，有對物之看法，事件之批評不能下正常論斷的傾向。春秋左氏傳裏面有「趙盾弑其君」的有名的論斷，這我以為是很拘于形式的

論斷。

「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屢諫，靈公不聽，及食熊蹯，脯而不熟，殺宰人，持出其屍，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食于桑下之餓人，倒載救盾，盾得以亡，未出境，趙穿弑靈公，襄公之弟黑臀立，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譏君子盾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故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云」

對於這事件，被稱爲聖人的孔子都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這便髮髯是倫理上的結果論；便是說，譬如趙盾越了國境，便是良大夫，稍微逃慢了一點，未出國境，靈公便被弑了，所以趙宣子是賊臣。——這真不得不說是拘于形式的論斷。這論斷是法理上倫理上的大問題，中國的論斷，我以爲決非正常的；不過這事在這裏可以不講，只要知道牠是形式論便是了。

那有名的復仇美談裏面的晉之豫讓，欲報故主之仇，再三不成，遂乞了趙襄子之衣，做了形式的復仇，滿足而自刃了。這些都只是史的事實的鱗片，這種事例和論斷，是能找出很多的。戰爭之際，有時候戰前布列陣形，互誇其整齊變化無窮，終日鬪着陣法，并不交戰；或者感嘆于敵陣之形式美而退了兵的時候也有。蜀之諸葛亮在祈山布八陣圖的陣法睥睨魏軍，這不一定便只是小說的捏造，這樣尊重形式的性質，到處都表現着的。

附 辭令之巧妙

重形式和體面的風習，使一般人都做了善于交際的國民了。漢人似乎從古代便巧于辭令的。孔子見蘧伯玉的使者的辯舌爽利，應對巧妙而嘆稱說：『不辱君命，可以謂之士矣。』孔子自身也是嫻于辭令的人。尤其是孔門之子貢宰我之徒乃有利口辯才的當代才子，史記的仲尼弟子列傳裏面寫的子貢遊說列國的辯口如流的

應對，實在是優越的。當時被稱爲士的人，大抵都是有辯口的善於交際的人。就中蘇秦張儀的辯才，是所謂東洋的台莫斯託克來斯，以六國之合縱連橫，橫行天下，真可謂是史上之偉觀。其他如魯仲連范雎，都是銖中之鏘鏘者，只要翻一部分史記列傳，便不得不對他們的辯舌是如何爽利應對是如何巧妙這事驚愕。孔子見其國人說話過巧，戒其弟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他們在戰爭等非常的時候，主將同道也常有開舌戰的事的；三國志裏面的孔明罵王朗便是其一例。

現今中國外交官的辭令之巧，還是無異于昔日。個人交際上，對談應接也是非常巧的，用的辭令都是不令人不舒服的。初遇到的客人，則馬上問貴姓貴處，與他作種種世間談，照例的虛禮和客套話之多，和親切待遇的樣子，使客人沒有不滿足的。日本等等也許會『過獎過獎』地自慢起來；不過當然這些巧妙的辭令，并非他們的真情。

《水滸傳》的豪傑們互相初次會見的時候，都是說什麼『聞兄大名，如雷震耳，今日何幸，如開雲霧而望青天。』有一次宋江會到那猛烈的魯智深的時候說：『久聞和尚清德。』這真令人發笑，對那粗暴的殺人放火吃狗飲酒的惡僧說什麼『清德』，這真是令人嘆服不止的。

日常之對談尚且如此，所以中國人的書信是使用非常巧妙的辭令的。給父母的信，給師友的信，給弟子兄弟的信，連樣子文句都有一定的。所以中國人的教師，常有使弟子代筆自己的家信，看也不看一遍便發出去的。

有口辯的國民，一般常是多多益益地辯的，所以關於多辯冗說方面，他們也許都要凌駕于歐美人；不會說話的日本人，決不能做他們的對手的。他們說一天話都是平然的。

第七 論趣味性

一、黃卷尊重

中國自古被稱為文字之國，中國人之尊重黃卷（書籍），乃世界悉知，據今日之中國學者說，這也只是少數讀書子，一般人是風牛馬不相及的。中國是文字之國，是行着聖人之教的國，這是住在日本內地，把中國理想化了的學者的幻影。普通總是這樣議論的。然而我們却不能遽與同意。以現在之事忘過去律未來，這是不行的。不錯，今日之中國國民裏面讀書子是不多，一般人的趣味也很低下，這都是事實。然而這是像中國那樣戰爭相繼的國家裏面的不得已的事，現今的中國，是他們的國屢次經驗過了的一樣，是從亂裏到革命的過渡期。過渡期之中國，在任何時代大抵都是現出趣味之低下，教育行政的混亂的。這是中國革命史告訴我們的地

方。若不懂這道理，則將弄出大錯誤來的。

中國人有趣味於書籍，這是自太古至現今的不變的性質之一。他們爲要將古代之記錄傳於後世而費的不斷的努力，是出于豫想之外。在沒有文明利器的當時，要保存太古的記錄，也許是人類最大的苦心。他們刻之於金石，書之於皮竹而保存了。在周時代的古昔，不單是官府保藏了牠，聖人之書等等，似乎在民間也多所藏的。以秦始皇之暴舉，尙未能燒盡儒書，這可以證明民間多儒書之所有者。中國從太古有「天官」這史官，掌了天下的文書；這是司馬遷說的。在宇內，勅選歷史像中國那樣完備的，大概很少吧。又歷代天子之值得賢明的名的帝王，都是文學藝術的保護者，漢之武帝，魏之武帝，隋之煬帝等等，詩人中也要算第一流的才人。唐之玄宗，宋之徽宗的繪畫，也是究斯界之堂奧的人；唐太宗那樣的英雄，尙且有書畫的名作，并且是文學的獎勵者，我想是值得讚美的。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那樣可驚的浩卷之書，由勅選而成，真是世界無類的事。

尤可驚嘆者，則爲歷代天子盡大努力於佛典之保護刊行的熱心。這世界最大的浩卷之書，傳承至今日，這實不得不說是一種驚異。

常盤大定師曾在大藏經雕印考裏面，像這樣說：（見哲學雜誌三百十三號）

「如上表，大藏經被欽定者，至少在二十回以上。簡直可以說是歷代的大帝，大概都爲之。以整理大藏，或制定目錄，或刊雕印行，應知乃爲歷朝之所努力。精善保存，及於今日，實是故也。雖說同奉佛教，三國之佛徒間的禮拜的對象自異。印度是佛陀之本國，故以禮拜納其遺物的塔爲主；中國是文字之國，故以禮拜黃卷赤軸的法寶爲主；日本是實際的國民，故以禮拜之中心置於佛像。中國的佛徒，古來對經典給了甚大的注意，歷代之間，幾次加純淨無垢之努力於經典之上，這是文明史之可珍者。幾千百種的譯出都完全傳承了，其間雖知有優劣正誤之別，然而不論新舊，不問有無誤謬，都同一樣地保存了，同一樣地尊崇了，將紛然雜然的典籍，在大藏經這名字之下，傳來於千數百年間，這毋甯使人生奇異

之感。古今有那一國雖有正譯亦毫不捨含有誤謬的的？中間有六譯七譯并行，同樣尊崇之，這是他國民所不能想到的。大藏中若捨重譯，則容量大減，因之保存上要力亦少。然在中國，毫不加取捨選擇，除自然散逸的以外，都傳到了今日。這是基於其國民性的尊重黃卷赤軸的風習，大概是因爲以這些法寶是可尊崇，而不可研究。所以以這樣的注意保存了的紛然雜然的大藏，於今日之研究者實爲無上之幸福。」

不單是大藏經，儒教的經典是不用說了，便如道教之經典以及諸子百家之類，不論是創作還是註釋，都將牠集合而保管起來的，這別國裏而是無類例的；并且涉三千年之久，經幾千戰亂，都還保存着，這更是奇觀了。

大藏經，四庫全書，及政治書的九通那樣，是由勅選而成的；個人也纂了可驚的浩卷的書籍。納蘭成德之通志堂經解，阮元的皇清經解那樣便是其一例；這些是高官的半官的事業，在民間，也蒐集了多數的著書，以私力出版。這些裏面的所謂

家叢，乃集一家之著作，專叢則爲專門編輯的經，史，子等等，而古逸則爲輯刻古珍版或古書之散佚書，佚文。他們中間有站在營利以外，投千金而付之剞劂者。愛錢的中國人立在純粹趣味之上出版數百卷的書，這是可驚的。

他們的古書，價錢一冊數百元一帙數千元，簡直和古董品一樣地賣買，這是很奇怪的現象，這當然不是粗惡的洋紙上面印上誤排甚多的活字的一時的東西，他們的所謂古書如宋槧本那樣，紙質良好，印刷明快，簡直是永久的書籍。中國的書，一面是美術品，刻得好的，是識字的人所都不禁流涎的。他們裏面的富豪舊家零落後隨時拿到市上來的古書，簡直是你搶我奪的狀態。

他們非常尊重文字，雖一般愚民，寫上字的紙片也都決不糟塌的。有日本人假裝的中國人因用字紙入廁，而暴露了其爲日本人。警世功過格裏面寫着拾有字的紙屑，一片一功，棄字紙一片五過，不淨之手繕書三過。歐陽修繕韓退之的書的時候，必以薺薇之水清手。中國人的家裏面，無論怎樣窮，總貼着有什麼字。聖人之

書，是將牠自身神聖視的。

一方面尊重黃卷，當然同時對繪畫有多大趣味的。畫院之制，起源遠自漢武帝時，至於唐宋，朝廷遇畫家甚厚，宋徽宗那樣，據說青丹之卷常不去其手，并且前面也說過，他自己也是一個可觀的畫家。因此終至被身囚金國，招了五國城頭的慘禍；這便是其弊害。因此他們的鑑賞眼也不凡，唐王維的山水訓山水訣，李嗣真的畫後品，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等畫論，若以牠是千年前的東西而看之，則頗爲高邁。中國人的趣味，普通都說是比較的俗的，然在繪畫，則尙氣品，稱神韻，所謂六法三病八格的鑑賞眼，是很高尙的。米元章的雲山圖，馬遠的雨中山水圖那樣，其爲如何神韻縹渺，乃不待說者之論述。

二、華麗濃厚，堅牢巧緻

中國人是實際的國民，所以他們居住的家屋以至於日常用品，是尙堅牢，且間有豪壯之風氣。裝飾於這些東西上面的色彩，他們似乎是喜歡濃色華麗的。

秦始皇之阿房宮，其規模之宏壯，乃古今獨步。據史記上說，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以坐萬人，下面可以豎五丈高的旗幟。這還單是阿房宮的一部分。唐詩人杜牧的阿房宮的記事，也許是詩人的想像，然而實足追想這宮是如何豪壯雄大的建築。

漢之長樂宮未央宮甘泉宮等等，其建築之宏大華麗，亦爲後代史家所讚嘆。就中武帝傾一代之雄才經略了四方，建築物上面，也發揮了豪壯的氣概，建設了不少樓臺。其中最有名的，乃築在上林苑的柏梁臺。臺上作承露銅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捧玉杯，以取雲表之靈露。便是這樣的結構。漢代宮室方面是最極其盛的時代，到了魏晉，宏壯的建築也不絕地建造了。然及煬帝出，興了凌駕漢武的大建築大土功，將中國人的好豪壯而華麗的性質發揮無遺。帝是兼有英雄之才的，可惜未得輔弼良臣，所以結果甚慘。帝築於洛陽的顯仁宮汾陽宮那樣，真乃極天下之偉觀的。

據史上說，他在大業元年發江嶺之奇材異石，又求海內之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圃，又開通濟渠，自長安之西苑引穀洛之水，以達於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於淮，又開邗溝入江，旁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人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以備遊幸之用。西苑之周四十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而注於海，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極其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爲花葉以綴之，沼內亦剪綵爲荷菱芡，色渝則以新者，好以月夜使宮女數千騎從而遊西苑，作「清夜遊之曲」，馬上奏之，或集樓船於汾河，奏笛鼓等音樂，縱佚遊。

其土功，建築之美觀，宮女的華麗的服飾，其樓船之裝飾，真是窮極了驚天動地的豪奢。

煬帝之豪奢，現在在白樂天的隋堤柳的詩和小說煬帝豔史等等裏面，還留着一點殘跡；其土功之一之運河，至今猶在，舟楫之利甚大。

此外歷代帝王，都用意于造形美術以及服飾等，其趣味頗爲廣汎。殿閣樓亭臺等等，到處的名所勝景之地都建設着。因項羽而有名的烏江亭，楊雄校書的天祿閣，唐太宗畫功臣于其上的凌雲閣，因唐王勃的文章而有名的滕王閣，因崔顥的詩而著名的黃鶴樓，其他如因范仲淹的文章而著名的岳陽樓，保存着昔日的舊跡的，現在還開而存在。

秦皇漢武煬帝的大土功，是代表中國人的豪壯而雄大的趣味性，這與我們日本的法隆寺日光廟本願寺等的代表我國美術是一樣的。他們的建築物，大都已歸堙滅，所以說者都是以史的事實作對象的，這真是非常可憾。然而明清時代的建築物，就中如北京的玉城和奉天的北陵等等，也有不少極東洋文明之粹的。又在寺觀佛閣，也可窺中國美術的片鱗；不過現代的中國，在這方面也很形衰亡的。不但不能看見像從前那樣的大建築，并且荒廢下去的建築物，也不能修理，真是可嘆。

彫刻是關聯於建築的，所以他們從太古便有了。若看禮器圖（這書有多少疑問

點），祭具的紋樣等，施有精巧的彫刻，現存的周之無專鼎（江蘇省鎮江江中焦山 島之焦山寺保存着）等等，便是其資料之一。

秦始皇集六國之兵器於咸陽，鑄爲金人十二；銅像等等，世界中也許要以中國爲最古。西京雜記上寫着：『漢武帝作七寶牀，雜寶案，設寶屏風，列寶帳於桂宮，時人呼之曰四寶宮。』文章不詳，所以不能知道得十分詳細，總之當時彫刻術似乎很進步。

後漢之光武帝彫刻功臣之像安置殿上；不久佛教便渡來了，佛像之彫刻，尤發揮了中國人固有的天才。

現時旅行南京的人，大概能在明之孝陵附近看見許多石人石馬的俑像吧。使用石頭弄成石刻，應用石頭建築，這風習很近於歐洲人。這大概可以看作中國人好鑿牢巧緻的趣味的表現吧。中國到處架着鼓形的石橋。張繼的詩裏面的有名的蘇州的楓橋等等，乃其代表者。

要「比較的意志」之力的彫刻，是適於中國人的事，石刻尤其是如此。彫在龍門的石壁的許多佛像，乃西人所不禁垂涎，近來許多佛像都被西洋人買走了，所以據說龍門的佛像沒有頭的弄得非常之多了。

石彫之偉者，則以秦山之諸碑，太古的石鼓文等等爲最代表的彫字。不僅是石彫，山東的孔子像，洛陽之關羽的睡像（木彫）等，是很著名的，巧緻方面，中國乃天下之雄。然而現在則也沒有昔日的風彩了。龍門石像之大者，雖日本奈良的大佛也不足誇其大，實爲雄大之作。現今當然是過去之夢；今日彫刻，只做小的了。

中國人個人，如寫細字，刻根附，陶器破了不用什麼藥只用錐和鎚去釘牢，在他們的浩卷的書冊上記入書目無一分一厘之差，這些事乃中國人獨特的長技。

如上面所說，他們愛豪壯的趣味，好堅牢，尙巧緻；另一方的趣味，便是濃厚華麗。這是下了一級的——便是說，趣味的低下俗惡了的；近代一般人的趣味，都俗惡化了。

中國自古便有服飾好濃厚的弊病。他們用了銅鐵紫赤黃等的無地之色，其中黃紫普通乃是禁色。我們日本，從平安朝的物語類看來，似乎也很用了些濃厚之色的，這便是模倣唐風的證據。枕草紙的著者清少納言曾嘲笑五位之官人穿全紅；赤色等等，總之是下賤人所用了的。

唐貞觀二年下令，叫三品以上以金色爲袴，穿綠色之服，一般庶民，則以鐵色爲袴，白色爲服。後來到了明朝，服裝便非常華麗。就是，富人則羅緞紗或絹織的金彩通袖，而以金彩膝襪爲裙。當初非官人之受封者不得戴梁冠，披紅袍，繫拖帶；後來富者都學了樣，不然則或穿百花袍等的五彩炫爛的衣裳。

所以若看古來的戰記，穿黃金鎧錦袍，或銀甲百花袍等以固身的軍將等等，粉飾是很燦爛的。水滸傳的英雄呼延灼攻梁山泊時的軍容：

「病尉遲孫立是交角鐵幞頭，大紅羅抹額，百花獸翠皂羅袍，烏油戩金甲，跨一匹烏騅馬，使一條竹節虎眼鞭，賽過尉遲恭。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鐵幞頭，銷金

黃羅扶額七星打釘皂羅袍，烏油對嵌鎧甲，跨一匹御賜踢雪烏騾，使兩條水磨八稜鋼鞭，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的重十三斤，真似呼延贊。」

這恰與我們日本的平家物語上面一之谷合戰的記事是好一對。日本的軍將，從前是風彩瀟洒的。著了附有櫻花或蝶之裙金物等的鎧。中國的比日本的用了濃厚的原色。

若看一看現今中國人穿的衣裳，他們是極好華麗的配色。裏面七八十歲的老婆，還插着紅色的花簪在那裏高興。至於少年少女，則好濃豔之色，拚命地裝飾。都是指環耳環的，輝着金色，在那裏得意。連男子也都穿着桃色或紫色的花長衫在那裏悠然闊步。瀟洒雅致的趣味，他們似乎沒有知道。就譬如說他們的菜肴，也是非常濃厚，一言以蔽之，便是趣味低下。

下層社會的衣服，是極端不潔的，汗和垢都在發光。他們似乎是不洗衣服的。不潔也許不能說是他們的趣味性，總之是每天全身浴的潔癖的日本人等等所豫想不

到的不潔就是了。中國普通人坐的三四等的火車，不論窗外車內，都是亂吐痰涕的。若粘在手上了，則或擦在窗子上面或揩在衣服上。鄉間的市井，則小便在道路上開着河，小販赤着腳往來於其上。與家畜相接，他們是毫不以為什麼的；全身浴是很少的，一生沒有洗過澡的人似乎都有。他們的住所，尤其是他們市中的一種異樣的臭氣，乃因中國人不厭穢陋所致。

他們的邸宅，多矮陋者，平民富者，都是千篇一律的建築物，像日本那樣清明，空氣流通，四面受日光的房子是沒有的，他們的房子，專只管要堅牢質實，陰沈薄暗，兩層樓是簡直沒有的，都是平房，屋內三面為壁，只有一面出入。

商店以外的家，必有門有牆，是儼然與隣家劃了的小城廓。他們的家，大抵造得入門一折而入于門內，有庭有家。大家是設了不少門牆，同一樣構造的房子一進一進地立着，陌生的客人，是不容易知道邸內之各房的。這一面是用以藏寶，以備盜賊；不過一面這也是中國人陰沈而有多少秘密的證據，這是說，中國人乏于光明

正大的氣象。這樣的空氣不流通的家庭中，住着和多數之家族與多數之畜生一起而不厭醜穢的中國人，所以走進中國街去異臭衝鼻，這是當然的。做着這樣的生活的中國人不懂什麼瀟灑，風流，意氣的趣味，這也是極自然的事。他們尚堅牢過于瀟灑。他們的房子，不像日本的家屋那樣富于雅緻，然是耐久堅牢的。脆弱的東西，雖美亦不適他們的趣味的。

飲食物方面的中國人的趣味，也是濃厚的。中國人從太古便多吃肉，所以似乎自然地弄得愛吃脂濃的食物了。食物方面，自古有費了多大苦心的形跡。飲酒之俗，乃起自太古，大禹曾特戒之。漢高祖辟易于羣臣的飲癖。到了漢代，則用油炙肉吃，作肉饅頭，以蜂蜜及蔗漿調理之。整狗整豬都有的。

到了唐朝，其食物之奢侈，取材之豐富，驚了後人。他們在六畜之外，鹿，熊，驢，狸，兔，鴨，鶉子，鱖魚，蟹蝦，蛤蜊，蛙，都作了食物。并其製造之精妙，乃屬可驚，鷄則有葱醋，乳淪，剔縷等的種種燒法，鵝則有八仙盤花，折鵝

糕兩種，其他還有種種烹飪法，真要使「食道樂」垂涎。味根只要有蜜酥醬油醋和其他香料等種，便足以揮其妙技。當時食品研究家，則有長安的張手美家花糕員外等烹飪專門家，每逢節日，即賣出其得意之食用品。譬如說元旦之陽餅，上元之油畫明珠，四月八日的指天餛飩等等，便是其一例。只要看韋臣源的食譜茶經等，大概便能知道千年前的中國菜肴是怎樣精妙了吧。

因此古來庖廚這事，乃是非常麻煩的職業。現今中國菜的好，也還是天下一品。他們是對菜肴本身有多大趣味的國民。試吃一吃中國菜肴，關於食物的研究是可驚的，魚鱗獸類的血，臟腑等等當然不用說，便是骨頭也煮了利用牠的。西瓜南瓜的核子，到了他們的手，都是成爲食用的。他們能將同一的豚肉作成二十幾種不同的味，他們的烹飪術實是巧妙的。南海之燕窩，蒙古之木耳，長江之鱖魚，日本之海產物等等，山海的珍美，無所不集，真也可謂熱心了。普通的人民也不像日本那樣單調，三餐都是米食。一日中一飯是米，一飯是餛飩，一飯是饅頭，很是奢侈

的。

然而他們的食味是頗濃厚而多脂肪分的。什麼都用油炙着吃的，所以吃得很淡薄貧弱的日本人等等，對其菜肴的濃厚，是難辦的。

如此，中國人在飲食物和衣服裝飾都有喜歡濃厚的性質，所以他對於女人也是很濃情的；不，大概應當說是多情吧。所以他們的文學中出金瓶梅肉蒲團，是毫不希奇的。中國的中流以上的生活的男子，都有西門慶流的型質的。

中國的男子，十四五歲以前是很伶俐；因早婚和多妻，所以精力很早便消耗了，大抵都化成了平凡以下的人。聽中國人的名字，總以為他是一個豪傑，然而一看他們的臉，肌肉總弛鬆不堪，都是朦朧的不得要領式的臉。神彩弈弈的活潑的臉是找不着的。這是一夫多妻國無論如何不能免掉的弊害。他們只拘于以子孫之斷絕為人生最大不幸的國風，而不知為人生最高道德的犧牲獻身的崇高的道德。他們中間，一生獨身，否，守一婦而為國家盡最善之努力，或為學問藝術獨身過活，這種

事是不很傳聞的。他們的最善之努力，有向子孫之繁榮，本能之滿足集中的傾向。據說他們中間也有家裏蓄了十幾個妻妾，還縱遊蕩于折花之巷的斯道之強者；這實在不得不掣蹙的。現今中國之文明漸衰，趣味性之低下，也許也是因為政治之腐敗混亂；不過說牠大半是因耽溺于女色的積習，也并非過言。

他們的好色，是歷史的遺傳性，很是惡疾的。雖堯舜，也非一夫一婦，孔子也尚且『好德不如好色』地滿着是認好色的口吻。齊宣王將自己之好色，告白于孟子。禮記說男女七歲不同席，男女間有嚴格的禮，乃他們的好色的豫防策。

中國的帝王普通說是後宮三千，不過事實似乎還要多一點。這不用特別舉出漢武帝隋煬帝，便是漢之元帝，他因宮女太多，難于一一相見，乃便畫工寫其姿容，遂有王昭君之嘆。這是有名的話。中國天子的短命的，畢竟是好色的結果；中國人的遲鈍，也是好色之賜。

中國的歷史，因他們尙形式美的性質的關係，所以閨門內事是完全被閉却了

的；不過中國歷史之衰亡的幾分，大概也可以看作好色的結果吧。

如上述，現代中國人的趣味，實不得不說是有專傾于物質的肉慾的而閉却了高雅的趣味的傾向。然而自太古至今日一貫着的趣味性，是「堅牢巧緻，間示豪壯的氣風，華麗而濃厚」——實不得不如此批評。

第八 論矛盾性

俄國氣候之變化激烈，其山河之秀麗之風致，國土廣大，單調無味。所以俄國人是多感而易激動，便同其氣候變化激甚一樣。疑義和信念，熱情和無關心，快活和悲愁；像這樣從極端走到極端，乃其特色。看一看近年的革命，那貴族主義的專制國，也是一朝而變成了極端的社會共產主義了。

其國土之廣大，單調這些地方，中國是伯仲于俄國的；然因其人種和地文的相異，所以國民的型質，簡直是各異其趣。然而中國國民也有中國流的相反的矛盾性。本來無論那裏的國民，多少總有些矛盾的；所以說述這種問題，固非本意，然俄羅斯和中國人那樣，這特質看來尤為顯著，所以我相信關於重要的矛盾性費一言，也非無益。

一 思想之矛盾

中國人富于實行，嚴守儀式典禮，很是意志的國民。儒教尤爲代表這方面的正宗，其教之根本義，乃以在當代養成有用人材，造就任一國之國政而無過的人物爲主眼。

《論語》裏面，賞顏淵之好學而稱其安于貧賤之德，并且『暮春者，童子五六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雖也有這種很脫俗的記事，然而大體看來，儒教的目的，還是爲了造就實用的人物。

然而與孔子幾爲同時而出的老子，則唱與儒教正相反之說。他小視人間的儀禮，否定了人智。所以儒教的根本的義禮（文化的制度風習等）那樣，他說反是禍人的本性的，人須從自然之法則，以合于超絕人智的宇宙之大道。所以儒教之教，若從老子之教看來，則不過是非常小的。

莊子那樣，則說禮是害自己本性的桎梏，一面又是世之奸物用以粉飾己非的東

西。講仁義道德等等的儒者，乃未悟有自然這大道的孺子。莊子并且說出「聖人不死，大盜不已」這有名的一句話。

如此相反的思想，非必待孔老才表現的，中國從太古便有同陰陽二面那樣的思想的潮流。

他們的古書詩書中，我們能看見可看作積極消極的二元的思想。譬如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那樣的人物，則是注全力于國家之發展，制度之確立那樣的國家主義的，很是形式的的文明的創造的偉人。然而別一方面，如許由太伯伯夷叔齊那樣的人物，則不置重于國家，王位那樣的事，他們乃是一種極高尙脫俗的人。吳之太伯，也許是有種種情形，不過其頗為超世的這事，乃是事實。伯夷叔齊也是一樣的。兄弟兩個似乎都沒有以治理自國為最大義務。他們以為眷戀于國家的王位，乃人生最大的恥辱；便同許由辭堯之讓一樣。所以賤周之文武之霸道，不食周粟，而至餓死于首陽山。就是嫌惡了爲了自己的野心而戰爭那樣的事；不單是如後代的儒者所

說，對殷守節。

這樣的例證還有不少。譬如說禹之子啓，不讓位於有德者而自己卽了帝位的時候，大諸侯有扈氏憤而起兵。到了後世，尙不絕地有這樣人物的對照。唐韓退之的排佛論等等，便是把中國人的二面性發揮無遺的。當時唐之天下，舉世都歸依了佛教，禮佛求經建佛殿喜捨僧尼，爲僧者如鶩鱗。

韓愈立於此間，專從常識和實利上，排擊了佛教。他不顧身之破滅，不理什麼佛罰佛祟，他想「中國人民拜跪無益的蠻夷之教，這成何體統」，徹頭徹尾，以實際的材料而戰了。不過韓愈之呼號，并非無益，宋儒之哲學，便是被他的呼號催了眠而生起的。

這不過也不可看作只是韓公一人罵退了佛。這樣的實際的精神，至少是占有中國人的半面的思想；這不得不看做共鳴於韓文公者甚多。雖如此說，然而佛教輸入了，中國人那樣的實際的國民簡直是盲目地附隨而歸依了佛教，這實不得不說是很

矛盾的性格。

中國的哲學，雖是倫理的實際的，然而爲思想發表之形式的文章，却很是想像的，專是情緒的事。這也是很矛盾的，若要詮索論理的矛盾，則終不能了解他們的思想的。西洋人說中國的老莊哲學是不得要領，不可解，這是因爲他們不知道那些是情緒的哲學。老子說：『上善如水，水善利萬物不爭，據衆人之所惡，故幾道。』這是以水說明道的情緒演繹。孔子在川上說：『逝者如斯夫，不息晝夜。』這是說萬物的轉變無窮；離去情緒，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他們的文學也是一樣的；想像力很豐富。西遊記水滸傳那樣，便是其尤爲代表的；尤其是人天感應，再加上一些道教思想，而有所謂神韻縹緲的東西。他們的戲曲則是說夢而使關聯於修仙，極變幻之妙的。這樣想像豐富的文學，我想是世界上最少見的。

便是像這樣，他們有理想和現實兩面，而有以想像的形式說實際的事實的矛

盾。

二 冷熱之二面

中國人以矯情喜怒不現於色爲英雄的特色，以直情厲行爲小人之事，努力隱忍以使理性活動；然而從一方面觀察起來，則頗有熱情的傾向。他們是有冷熱二面的國民。

後秦之苻堅，曾率步兵六十萬，騎兵二十七萬，號稱百萬，去犯晉。這於偏安於南方的晉，實乃國家安危之所決。當時晉之大宰相謝安，以兄之子謝玄爲先鋒大都督；自己却在本營和客鬪烏鷺。不久使者便傳來了捷報。謝安把牠讀了一遍，置於座右，平然終碁局，回答客人說，小兒輩已無事破了賊；泰然如常。等客人辭去了，安入別室，歡喜雀躍，不覺手舞足蹈。——其矯情自制，畢竟不愧是一國元首；不過這個逸話等等，也是表示中國人如何尊重自制的好例。遇着事情神色自若，這是非常被尊尙的；不一定要是謝安，這種例是很多的。遇着事情不得不冷

靜，這實是中國人有的的一面的性格。

然而一面是這樣地矯情，理性的，別一面却有非常容易激情的性質。熱心國事的青年等等，痛憤自國之現狀，感情激起的時候，屢有割腹以示其志的。或者上講臺論事的時候，自己被感情所激，悲壯慷慨之處，常是聲淚并下。這樣的激情的例子，不遑從古來枚舉。燕之荆軻怒髮易水，這樣的例是很多的。近時革命志士，賭着身命，橫行天下，其間頗多熱烈的行爲。那關於鐵道問題或對外國借款的反對運動，或抵制日貨運動那樣，實是非常猛烈，簡直是其勢不可當。那愛錢的中國人，聽到了這種演說，完全興奮了，自己的所有物拿着什麼便投什麼，連懦弱的婦人們都拿出時計指環，說『請拿這個去作買收鐵道的基金吧』，簡直熱狂得如失了理性一樣。熱情燃起的時候，是難以理性解說的；他們有這種性質。

三 差別的而又是平等的

中國人一般的風習，很守禮儀，君臣之分，長幼之序等等，很是形式的。家

長之命有不可動的權力；上下之區別很嚴重，很講究身分，政治的差別是很嚴格的。

然而反過來再看一看中國人的社會的狀態，則似頗平等。日本自古有貴族階級；一般平民，從前是不能參與政事的。豐臣秀吉以不出世之英雄，握天下大權，爲平民吐了萬丈之氣；然而這不過是戰國亂蕪時的唯一異例。

中國從周代便設有科舉，常勤於羅致民間之賢能。日本是沒有這樣的制度的，關白則爲藤原氏，武門則爲源平二氏或其一族，平民是鑽不進政治界的。

中國歷代之天子，常苦心努力，務使賢不遺於野。科舉之制，後代雖也許有了種種弊害；然有學德者，決不因其爲農民而不能應科舉。當然多少也有些除外例。譬如說身心不清白的人，如因金錢借貸而賣了身的人，刑餘之官奴，或娼妓俳優之子弟，這些人是不能應科舉的。然而這也並非絕對的。若全廢了娼妓業或俳優業經過了兩三代，則算身心清白便能應科舉的。

日本的一般的庶民，無論怎樣有才能，都非一生沈淪於下層不可。兩者真不能同日而語了。當然這事歷史很長，也許有多少例外，然而大體農工商的庶民，是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利的，并且也沒有可參與的機關。德川時代的武士和平民之區別之顯著，據說是平民在途中遇到了武士，則應以手挨地行敬禮，簡直非近代人以常識能了解的。

中國是稱讀書人之有德者，就是一個有人格的讀書子爲士而尊敬他的；爲應科舉而學修的人謂之士習。

便是這樣，設了禮和官制的差別，講究得很麻煩的中國人，一方面是有這樣的平等性的。

四 排外的而又同化的

中國人自稱華夏，稱四周之民爲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把他們當動物視了，也問有全然不當他們是人的記錄。他們誇示自己的文化，以爲他國的文化無優我者。他

們常文化的排斥了他民族。

然而漢人古來以自力征服的民族，如苗族，吳越人，他們既然降伏了，則和他們一起居住，以自己的文化，次第同化之，於數世紀後，常把他們化得與漢人同樣了。

這個同化力和抱擁性，乃中國人的最崇高的特性。試與歐美人印度人比較比較看，白頭平等，以自由做招牌的耶穌教國民，劫掠，慘殺，牛馬視，酷使征服地的人民，兩者真非同日之語了。由來人的嘴是最好聽不過的。試看以自由平等正義人道做招牌的美國，他們是如何陰險而非平等的嚟！

中國人雖立着形式的差別什麼蠻夷等等，然而匈奴入則同化匈奴，鮮卑入則亦同樣抱擁他們的。五胡十六國等蠻人，很慘待過漢人，然而漢人也同化了他們，使他們也變成了勤勉的中國人了。

歐洲人，從希臘羅馬那時候起便把被征服民當做奴隸，其主人是有生殺與奪之

權的。羅馬的貴族，使被征服民的強者與猛獸打架，以供他們的娛樂。印度人給被征服民以「首陀」的最下層的地位，用之爲奴隸，征服者則專事無爲徒食。

美國的南北戰爭，是奴隸解放的戰爭，是表現白人的一進步的，一般人雖如此說，然而美國人還是沒有停止虐殺黑人。白人一般都是殘忍酷薄的，在排外的這事上，不能與中國人等等同視的。

歐洲人古來看奴隸同物品一樣，不滿自己的意思的時候，則切鼻割耳，這是很普通的事，少忤己意時，便慘殺之如切蘿蔔。

中國人自古沒有聽說有買賣奴隸的事。他們卽有奴隸這名目，也與歐洲的奴隸是根本不同的。他們因金錢上的借貸關係，所以賣了身的，所以根本還了錢的時候，自己還是自由。又稱刑餘之人曰官奴，使用之形式和奴隸相似，然而這也是因刑之輕重而做奴隸的時期有長短的，只要刑期中當了奴隸，此後便是自由自在的。

由此觀之，中國人之說「中華」「蠻夷」，畢竟乃文化之程度之差，并非嫌恨

人種本身。

所以宋與元戰的時候和明與清戰的時候，主要不是從人種的見地上而戰，是爲了他們的文化風習而戰的。所以金和清統轄中國中部的時候，也不得不取尊重中國人的文化風習的政策。政治的征服了漢民族的異人種，常是倒反被漢人的文化同化了的。以滿洲人的氣概和勇武，也僅在數十年間，棄了他們固有的氣俗而變爲文弱愛錢的中國人，被同化得連滿漢的區別都沒有了。

便是這樣，漢人有一方是排外的一方愛平等的性質。

五 文弱的而是強韌的

中國人是文弱，一般是很懦弱，這是公然的事實，然而自己道裏的爭鬪却很是拚命的。在這裏我可以舉出私鬪的最顯著的例，以說明中國人之個人的有勇氣。

嶺南地方，有械鬪之事。這是聚族生活的結果，被稱爲強宗強族的，往往結黨集羣，橫行鄉里，強宗和強宗約了日限而亂鬪。

大凡要行械鬪之時，則掛大鼓於庭中，置酒而招集同族。要相攻擊時，則鳴此大鼓。有此大鼓者，謂之「都老」，乃他們的大將。他們將同族祖先之敗軍和恥辱刻在掛在他們家裏梁上的弓箭上面，積世之怨是一定要報的。都老宣戰，則一村中之老幼，都歡喜踴躍，女子小孩則宰牛羊，備糧食，以待都老的命令。兩方的人數都各有限制的，互相激勵而格鬪。其間雖有觸鋒鏑而喪命的，父母妻子也決不悲哭。因為哀泣這事若被敵人知道了，則其族全體之非勇武都要被敵人知道了的。據說其讎結數世而不解，官權也不能如何他們。

這械鬪有時是因一族中有不良之徒，因為欲張權力于地方且以誇自己的勇力而挑戰，有時則因隣接地之爭等等而起。中國的地方官，因之而地方的自治上大不好辦。然而從一方看來，如馮桂芬所說，一面也有團結防盜賊，免濫官汚吏之害，災害之時相救的特長。

總之這事於「公戰」頗為怯懦的中國人，實不得不說是奇怪的事。

明太祖之謀臣劉基曰：「民猶如沙，有天下者，唯能搏而聚之而已。堯舜之民，如以漆搏沙，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沙，而霸世之民。如以水搏沙。」劉基畢竟高明，以中國人喻於沙，實不得不說是有洞察之明。沙聚結力是脆弱的，然檢其各個，則其組織乃意外的強韌。中國的國家，雖然顛覆了十幾回，然其國民却愈繁衍愈發達的，這畢竟是因為中國人的個人的要素堅固的緣故吧。

總之中國人團體方面是文弱而缺乏凝集力，然個人方面則有較為強健的性質。

六 貧富之兩極

貧富之差，任何國都有的，尤其如歐美，其差漸甚；本來是不應拿牠當做國民性而討論的。然而看一看中國人的貧富關係，則能看出他們發揮從極端走到極端的性質無遺。

中國的富人，則如王侯，而貧民則又極端的貧；中國的社會裏，是沒有中等社會的，社會只分作上下兩階級。富者則擁着宏大的邸宅，儼然過着優於王者的生

活。康熙帝曾嘆息說：「身在天子之位，不如蘇杭十萬富豪之豪奢。」他們左右圍繞着許多妻妾，天大本領便只是作詩詠歪調，至於說生在此世將何爲乎那樣的嚴肅的問題，是絲毫沒有想過的。清朝第一的小說紅樓夢，乃把他們的富者生活真實描寫出來的，以紅樓之少爺寶玉（年十七）作主人公，以寶釵，黛玉，只要聽聽名字青春之血便要湧起的所謂金陵十二釵的美人爲背景，而描寫了賈氏一家的豪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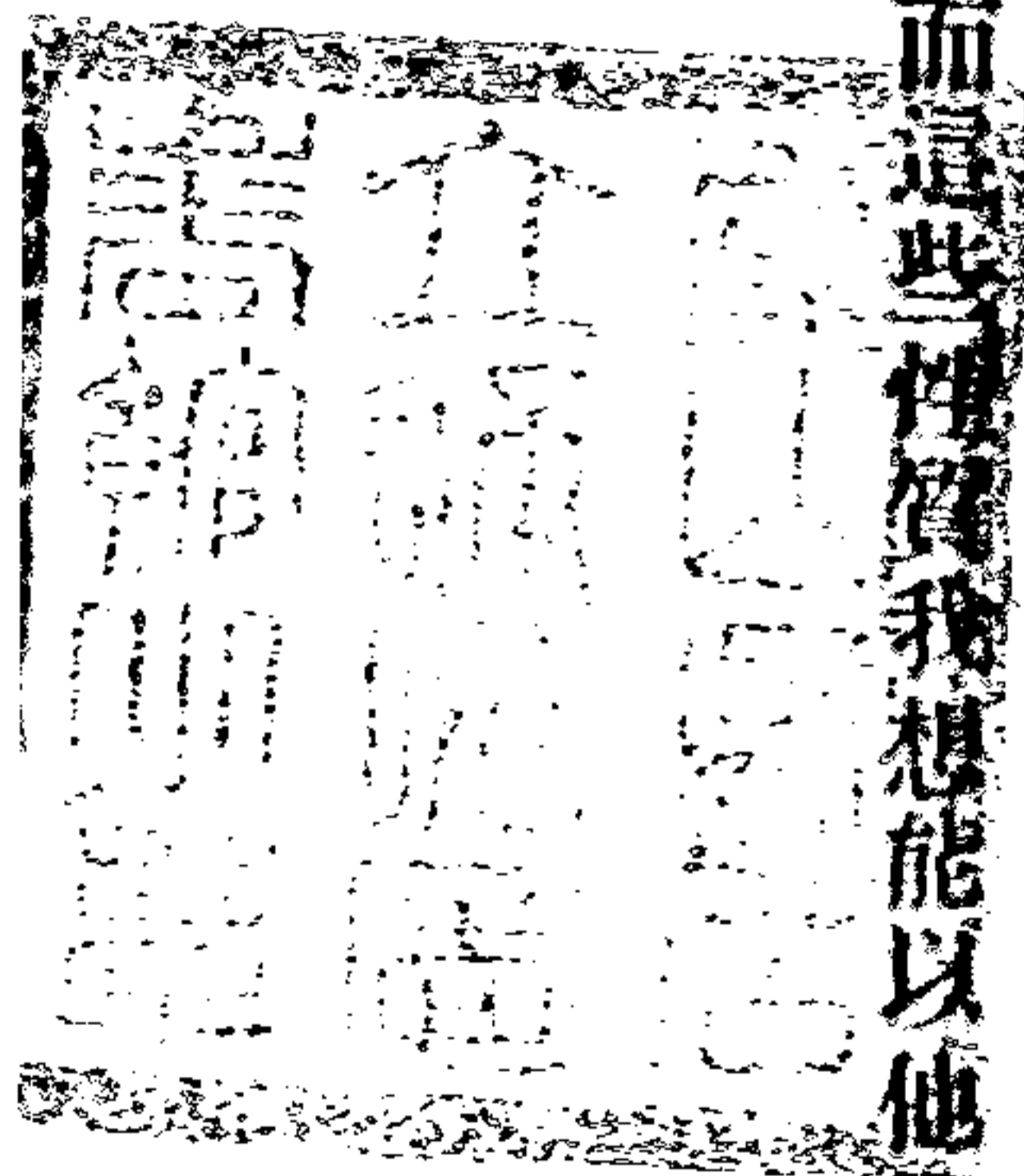
這小說的銷數大概有數十萬部，清朝雖禁過牠，然而隨毀隨印，至紅樓夢的續篇及改作的，至少不下十數種，續續出世，發揮了所謂中國人的雷同性；繪畫彫刻是不用說，家具的模樣都應用着，也可見中國一般人是怎樣憧憬於這樣的生活了。凡是富豪貴族等等，大概都是低腦的，他們的趣味不是下劣便是深逸而徒壯大外間的形式，這那一國都是一樣的；不過中國人在這一點乃是更穎脫的。

至於中國的貧民，則也是極端的，乞丐之多，天下無敵。到了冬季，北京城并且還是在衙門內都呈出餓死者和凍死者。多的時候，據說一天有五六名的餓殍。他

們生於乞丐，則一生爲乞丐。車夫，馬丁，流浪，過着這樣生活的人也非常之多。在北京坐車，叫也沒有叫，車子後面便有幫推的人，多的時候能有五六個。他們的樣子，似乎毫不以自己的貧乏爲苦。他們沒有發奮力，以爲貧乏是天命，所以也不想什麼法子了。他們中間稍有氣概者，則爲算命先生或爲流氓，竊待風雲之到來，希冀一朝有事，便一躍而爲富人，有時天子之位都窺竅的。

他們一方面是勤勉的，漸進的；別一面則具有交易所的飛躍性。這也不得不說是矛盾的性質的。

以上略說了的六項，乃中國人的矛盾性之主重者。此外個人的而富於雷同性，保守的而又不厭變化，這些也是屬於這個部類的，然而這些性質我想能以他們的自利心說明。



總簿 04735 號

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版

每册實價四角

著者 渡邊秀方

譯者 高明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平楊梅竹斜街

■04735